



中国过渡时期书信体时论研究（1898-1919）

A Study of Epistolary Essay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Period (1898-1919)

陈耀棠

TAN YEOW TANG

20ALB0595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4

目次

宣誓.....	III
摘要.....	IV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综述.....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范围.....	6
第四节 研究难题.....	8
第二章 书信体时论之嬗变.....	9
第一节 书信体之书写溯源.....	9
第二节 过渡时期之书信体时论.....	12
第三章 书信情与辩：从感性到知性.....	22
第一节 书信体时论之情：救亡图存.....	22
第二节 书信体时论之知性.....	27
第四章 公开与公共：书信时论政治化.....	35
第一节 书信隐私公开化.....	35
第二节 书信体书论之公共性.....	40
结语.....	45
参考文献.....	48
附录.....	52

图表目次

表（一）：报章上具编辑痕迹的书信.....	52
表（二）：1917年至1918年《新青年》关于文学与文字讨论的通信专栏标题	55
表（三）：1918年至1919年书信中的敌人刻画.....	58
表（四）：《新青年》通讯栏的罗列内容的书信.....	60
表（五）：其他报章罗列内容的书信.....	61
表（六）：其他报章的辩体书信.....	61
表（七）《新青年》通讯栏的辩体书信.....	63
表（八）：书信成为一种公开习惯的例子.....	65
表（九）：知识人有“言之责”的例子.....	66
表（十）：公开信针对的群体类别.....	68
表（十一）：《新青年》书信讨论表.....	68
表（十二）：书信议论题目底下的来往书信.....	75
图（一）：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三号〈东海公来简〉首段部分被裁剪...	76
图（二）：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三号〈东海公来简〉尾段与〈章太炎来简〉 首段被裁减.....	77
图（三）：《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通信栏的目录.....	78
图（四）：《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反对“世界语”〉——胡适复朱有昀信..	79
图（五）：《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反对“世界语”〉——朱有昀致胡适信	80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TAN

姓名：陈耀棠 TAN YEOW TANG

学号：20ALB05954

日期：2024 年9 月1 日

论文题目：中国过渡时期书信体时论研究（1898-1919）

学生姓名：陈耀棠

指导老师：方美富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书信体时论，顾名思义是以书信文体书写，在报章上发表的时事议论文章。书信原先仅作为私人关系中的表达，然而随着清末民初新型报章的出现，开始渐渐通行于各大报章的栏目，其中报章设有通信栏，促使了大量的书信体时论出现。书信体时论撰写的场域变化，从私人进化为群体的互动关系，其书写目的亦不如同私信，而是作为一种报章教导国民的媒介。书信体游走于公与私之间，从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失败后至五四运动期间，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十年与五四运动前五年，知识人全情投入，化私为公对于国家“救亡图存”讨论尤为激烈。书信时论以导民为目标，其书写特性亦向时代与读之间的需求转变：情感上以凝聚国民为主、议论上以说服国民为要。本文借由书信文体的公开展示，来看过渡时代底下知识人转化国难的道德与忧国双重焦虑，所展现的一种隐私政治化的情理现象。报章作为文明传播利器之一，书信文体的设立与社会的重视，形成一种社会公共精神。

【关键词】 书信体时论、感性与知性、公开化、公共性

致谢

感谢方老师、陈同学、父母的支持与帮助。

另外，公公这是一份我送你的礼物，愿你在另一个地方一切安好，想和你说：“我要回来了，我毕业了。”

绪论

梁启超（1873-1929）于一九零一年言：“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¹近代中国自戊戌维新以后，力求“人群进化”²。知识人之间对于“如何进化”都争论不休，大量报馆的成立形成投稿报馆的文字笔战风气。各大报馆杂志之文体应读者或革新分子政治宣传需求进行变动，如由梁氏创立的《时务报》设立了论说、上谕、奏折、资料、外国报章杂志翻译、文艺等专栏³，所谓“有益于国事”者，几乎涵盖了大多数文体，其中便有“书信体时论”——顾名思义以书信体来撰写时事议论的文章。

第一节 研究动机

近代中国，上至政治机构，下至社会各大阶级被迫接受欧洲事物的输入，思想上都备受冲击。社会知识人被欧洲各国的“现代”思想所震慑，顿时兴起“师夷长技以制夷”⁴的风潮。报馆就此刊登了大量知识文人倡反西学的议论文，无论是守旧派、改良派、以及革命派等人，皆以文章的形式来宣传其政治思想。报馆的知识人自认肩负“救国与启民”的大任，梁启超更以书信体文章——〈敬告同业诸君〉来说明报章的职责：“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

¹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过渡时代论〉，《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页 292。

²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页 292。

³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页 171。

⁴ 【清】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卷 1，页 1。

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也。”⁵前者报馆作为媒体来执行，后者开国民之智则需依笔下文章，更何况“尺牍之美，非关造作，妍媸雅郑，每肖其人。”⁶，文有别裁，其写作方式备受瞩目。

就此，不得不让我思考何以书信体经过历代的文学演变仍然通行？或许从周作人《日记与尺牍》一文中可得到答案：“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⁷从文学抒情的角度出发，书信体因强烈的作者特质得以流传，解答了先前的疑惑，但具强烈作者情感的书信体如何满足过渡时期救亡图存之需求？这便是本文欲解答之困惑。本文参照《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小见大，选取报章最具代表的文章来窥视当时思想潮流⁸，其中引人瞩目的是不少尺牍，居然扮演一种“原始察终，见盛观衰”⁹的角色。

书信体发展另外一条跑道是“书信体小说”。十八世纪欧美书信体小说的大量兴起¹⁰，书信体小说被翻译传入中国，但正如陈平原所说的都不曾大张旗鼓。直到一九一五年包天笑（1876-1973）的《冥鸿》才正式将书信体带入小说形式。¹¹可见书信体一直以来都停留在应用文体上，鲜少跨越其界限进入其他文体。虽书信体占有一席之地，但又在文体学的演变中反常低调，皆因其强烈的抒情特征难以撼动。基于欧美书信体小说的流行，多数的书信体研究集中于小说体，学界大家如陈平原、周作人（1885-1967）或欧美书信体论著都集中于讨论书信体小说。

⁵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页649。

⁶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目〉，《駢體文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页33。

⁷ 周作人，《雨天的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0），页10。

⁸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页3。

⁹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2875。

¹⁰ Janet Gurkin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

¹¹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201。

书信体时论之研究羽翼未丰¹²，故其开拓成本相对高，正是论文的成果切要。

借由梁氏言报馆为国民导者一说，报章在选取刊登文章，抑或作者在撰写投稿文章，其用意定以“开民智”为导向。此处生起了若干疑问：究竟为何选取书信为一种报章公开文体？若因其特性，书信又如何为社会建立其所需之公共性？究其根本仍是书信体时论如何满足近代中国知识人的要求？若能，书信体在议论文领域其形式如何在过渡时期达到知识人救国与启民的目的，以上种种全是本文欲以解答之困惑。

第二节 研究综述

“书信体时论”并不是主流的研究题材，但可从前人研究中吸取研究养分。书信文体研究著述并非始于近代，早在魏晋时期业已存在。近代学界的研究大多以书信体小说为主体，针对报章书信体而论的相对少，但仍给予我研究上的启发。

较早具备系统性的文学研究著作《文心雕龙》，收录了〈书记〉篇，故可从此窥探中国书信体的书写传统。对于书信体进行了总结：

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¹³

书信体的本质是“尽言”与“散郁陶”，以书写者内心情绪畅言为主，说明了书

¹² 从近人研究来看，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学》等文体研究著作、所言及之书信，虽然都谈及书信著作化之倾向，但不妨皆是专注其个人抒情与文学性方面，如书信小说等，鲜少触及报章书信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

¹³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页456。

信体抒情的感染力，然心情的交流是建立在书信“条畅”“优柔”抒写的形式，点明了书信体抒情特性与其抒写形式有直接的关系。但其美中不足在于，《文心雕龙》过于重视书信的抒情性，视书信的作用与诗歌抒情特质相同，而忽视书信其他特长。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学》基于“本在尽言”，对中国传统书信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从各种题材的书信进行讨论，确立了书信文体本身的多样性，不全如《文心雕龙》言抒情而已，整理了书信因应内容主题的变化，出现文风上的转变。褚氏认为书信较一般文章更带私人色彩，能够看见写信人最真实的一面，故视其为重要的史料。从史料的角度讨论书信，显然作者欲以突出书信作为人物研究的真实价值，故本文可借鉴褚氏之观点来一窥书信体时论所呈现一种公共领域¹⁴的意识形态。褚氏言之“预设读者”的设想较为瞩目，指出写信者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特性。此说法并非指书信的真实性存疑，相反的点出书信的私人关系与读者群，往往能够呈现写信者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珍妮特·古尔金·奥尔特曼（Janet Gurkin Altman）*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 针对书信体抒情性总结出功能性的概括：

Given the letter's function as a connector between two distant points, as a bridge between sender and receiver, the epistolary author can choose to emphasize either the distance or the bridge.¹⁵

作者可选择放大或缩小与读者之前的桥梁。珍妮特的论述说明了书信体的运用是作者一种有意的行为，甚至能被作者操控它的与读者的距离。珍妮特言：“the letter

¹⁴ “所谓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实践，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汪民安主编，〈公共领域〉，《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页91。）

¹⁵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 13.

form seems tailored for the love plot, with its emphasis on separation and reunion.”¹⁶, 书信体特征对于情感包容与突出,且作者具有最大权限去控制它,或许是近代知识群体试图建立社会“公共性”的桥梁。珍妮特的论著提供本文对于欧美书信体抒情的特征别于中国论著的纯粹“本在尽言”,更进一步提出了书信强调分离与团聚。

论及书信的区分,弗雷德里克·卡拉(Frédéric Calas)《书信体小说》指书信作者有意模仿真实书信的私密性、个体性、相互性¹⁷,主要就是为了隐藏沟通与虚幻的痕迹,尽量让书信读起来更加“真实”。显然公开书信作者会因应读者目光,在书写上更为刻意,但无论如何隐藏,正如陈平原言“书信的著述化本身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装腔”¹⁸。卡拉指书信体小说因形式上的特殊性,使读者能忘记作品不是虚构,是真实的信件,进而进入作者有限的主观世界。¹⁹弗雷德里克之“作者有限主观世界”,似乎说明书信与生俱来的特质,能够让读者接触写信者之思想,本文不妨以此设想来看书信在公共领域的发挥。

论及书信之抒情,不得不触碰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所谈及“真诚”²⁰的表现。值得注意,特里林认为真诚不是个体的存在出现,而是以一种具互动关系的社会存在:

Doubtless, when we think about sincerity, we first conceive of it as a quality of the personal and private life, as bearing upon the individual's relation to himself and to others as individuals.²¹

¹⁶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14.

¹⁷ 【法】弗雷德里克·卡拉着、李俊仙译,《书信体小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页3。

¹⁸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页205

¹⁹ 【法】弗雷德里克·卡拉,《书信体小说》,页51-52。

²⁰ 真诚(sincerity)是指表现在外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2.)

²¹ 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 26.

书信来往似乎就是个体真诚与他人相连接的具象化，特理林更指这种连接，与王国、国度不同，前者的个体有批评的权利，更有以此为己任的个体。²² 或许本文可照特里林的观点来观看中国，过渡时期之报馆群体与知识人，他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真诚地将个人感情投放在公共领域里，寻找与其相互应的知音，就是别于国、国度的连接。

第三节 研究方法 with 范围

本文将所采书信时论例子，限定于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九年之间，因这段时间是改良运动后，思想激荡最为激烈的时代，且期间经历辛亥革命、未经历五四运动之改革，社会百废待兴，报章上不同的思想与主张大量串流，其忧国情怀最为高涨。本文将针对书信体时论的体裁进行讨论，故不得不涉及俄罗斯形式主义为研究方法。正如上文所说，“书信体时论”作为当时非主流的文体，其对读者而言是相当新鲜的。什克洛夫斯基（Iosif Shklovsky, 1893-1984）言：

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是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他就是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²³

²² 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26.

²³ 【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着、方珊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页6。

显然书信体结合时论是创造者试图以“反常化”和“复杂化”的形式来颠覆读者一般的认知，而其动机正是要通过文体使读者改变既有的思想。职是，以上的论述提供文本形式的思路，过渡时期大量出现反常化的作品，如新小说、书信体时论，正是要改变社会的既有思想，故本文以俄罗斯形式主义来研究书信体时论的知性（第三章）。

过渡时期的时代氛围，呈现出一种具有时代意识形态的抒情，正如王德威所言的：

“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因此对西方启蒙、浪漫主义以降的情感论述可以提供极大的对话余地。²⁴

以“情”作为一个论述和情景来看，书信呈现不是一种单向的个人抒情，而是一个时代群体的缺失主张。通过王氏所定义抒情去看待书信关系中的抒发，方可辨识出情中的时代叙述。

书信作为一种具备高度隐私的文体，阅读者应限于写信与收信人而已，但是这种隐私进入公众视野后，它的本质就进行了质变，兼具了私人关系与公共领域之间互相利用的关系。借由报章书信来研究过渡时期之意识形态，便是窥探当时知识人的一种隐私公开习惯，即一种自救与转化焦虑之社会性方法。王汎森总结出隐私公开化的传统本因：

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股巨大的道德转化的焦虑，在这股焦虑之下，人们急于提升道德层次，但是又认力靠着自己的力量无法完成这个工作，所以需要藉

²⁴ 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10），页5。

助他人，一方面帮忙发现病症，一方面进行最无隐讳的批评。故要求人们将自己最隐秘的思虑与生活公开化，由他人帮助检讨批评。²⁵

王氏针对中国隐私公开化的三种方式进行整理，得出以上中国道德转化的传统需求。此种“道德焦虑”无疑是过渡时期知识人忧患的共同难处，在公开的传统下，书信便是最好的媒介进入公开领域来达到转化焦虑。本文将以王氏所言之“焦虑转化”来一观书信私信来往的公开，如何转化知识人之亡国焦虑。

第四节 研究难题

书信的出现，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整理书信时候，需要辨别这封信上写给谁？回复谁？这对于资料相对缺少的本校图书馆是相当困难去查找确认的，且信件往往不会注明回复哪封信件，仅留名而已，故在收取书信样本较为费力。书信时论的中文研究较少，多数是书信体小说或家书研究，相对的却留下了些许空隙，故唯有借鉴书信各方面研究思路，来研究时论。

报章上的书信众多，但是往往质量参差不齐，故需要经多次对照与查阅，方才寻得质量较好的样本。幸得前人整理，可从个人全集、选集、报章全集中，寻得质量经过审核之书信。唯有书信体时论的资料查找较为费时，主要其不如家书、私信等，皆有以类整理书信出版成集，如《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等，书信时论多数出现在报章或夹杂在全集中，故需更仔细查找。

²⁵ 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页162。

第二章 书信体时论之嬗变

文体研究者展开任何研究，几乎都不得不溯本求源，究其根本，唯有如此方能深入其研究。随着时代之流变，书信推而广之与公共领域结合，在过程中其写信与收信者之二元关系本质上的转变，形成一种属于时代的“过渡时期书信体时论”（以下简称“书论”）。本章旨在追本溯源，梳理书信传统之书写、抒情特征、书写群体上，掌握书信的基本面貌，在此基础上梳理书论固有与变化之书写本质。

第一节 书信体之书写溯源

自汉代以迄，中国的书信业已脱离公牍的性质，主要成为个人相互交往的工具。²⁶诚如绪论所言，传统书信体本就是“心声之献酬也”，其天职本就在表达“情”，与一般具强烈知性特征的论说文有别。从徐望之《尺牍通论》论及的书信特征中，便可一观二十世纪初，中国学界对于书信的定位：

尺牍兼为情感之文，尺牍中有极富情感之文字，开适清灵如诗歌，可以手舞足蹈，可以悦性怡情，绝非理论文章，冠冕堂皇，恪守绳墨者比。²⁷

自南朝梁《文心雕龙》至民初的《尺牍通论》，书信的抒情特征都依然作为文体

²⁶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页 375。

²⁷ 徐望之，《尺牍通论》（烟台：中国银行同人消费合作社，1935），页 16。

的主要成分，其具备的感性特征与私人色彩，亦是文人趋之若鹜地使用的原因。

虽说，书信体历经唐代古文运动的改革，扩张了书信体的内容，往更广阔的范围发展，凡是文学、论政、学术的题材都相近出现，但皆处内心情感之言，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²⁸。书信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往个体情感之外发展，时至明清出现了新的变化，上位者的强权统治，鱼雁来往的议论空间被强力压缩，虽来往更为频繁，但题材却往个人抒情发展，尽量避开政治与社会现实²⁹。避开政治现实，清代书信写作者更倾向于书写家书，以倾述或抒发个人的情感来保障自身。³⁰

从欧美学界来侧面观照书信特征，便可知书信与情感的紧密：

In fact, the letter form seems tailored for the love plot, with its emphasis on separation and reunion. The lover who takes up his pen to write his loved one is conscious of the interrelation of presence and absence and the way in which his very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reflects both the absence and presence of his addressee.³¹

书信文体的写信人与收信人的缺席，使得写作者或读者都会在接触书信时，都会有意识的感受对方的存在。写信者会投射自我对预设读者（收信人）的感情在书信中，而写作者缺失亦会使读者有意识去感受书信中写作者的存在或感情。从民初报章上能够感受到书信动之以情的特点，一九零三年《新民丛报》（第二十五号）刊登的公开信〈敬告我国民〉：

²⁸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页 382。

²⁹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页 386。

³⁰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页 388。

³¹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13.

寓书于《新民丛报》读者诸君，冀以间接力得普及于我所敬、所爱、所恋、所崇拜、所服、从之四万万国民。……国民聚族以居此土者既四千年，乃会无人事上历史上可纪念可庆祝之一日，而惟取无意识之天象，蹈常习故，聊以自娱，即此一端，而其为国民羞者固已多矣。³²

写作者对预设读者之眷恋，以及对其身处之国家之担忧，无论用词或口吻都极具关心，正是写作者在写作时感受读者的存在所营造出的。当读者阅读时，亦能感受写作者对国民担忧之急迫感，全赖于书信充当读者与写信者的情感桥梁。

鲁迅（1881-1936）〈摩罗诗力说〉有言中国统治阶级为了管治人民，以各种框架来约束人民以文学作品发声，如“诗无邪”³³。相较于诗歌、骈文等，书信主张尽抒心声，其内容和体裁并无过多限制，书信必然发展成内容多样，与骈文和诗单一主题不同，经常出现公私掺杂的讨论。一九零二年《新民丛报》（第二十四号）节录《法时尚任斋主人复简》刊登，黄遵宪（1848-1905）来信与梁启超讨论曾文正传之事宜，但其全文不仅讨论曾公，亦讨论黄氏个人文学作品，并相求与梁公：“当令大小儿携之来，饮食起居有人照料，但乞公为谋一学堂，以何为宜耳”³⁴。可说是情、理；私人生活与公共话题的结合讨论，往后书信体试论亦然。

中国自汉代固有“以文会友小寓学于书”³⁵的习惯，时至宋代已有书信隐私权的意识，凡是私自偷窥他人书信皆视为不德³⁶，故文人与官僚可无所畏惧地尽吐真言于书信。中国的书信风气较于旺盛，相反欧美的书信发展未有形成一种完成

³²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敬告我国民〉，《梁启超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页114-115。

³³ 鲁迅，《坟》，《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70。

³⁴ 黄遵宪，〈致梁启超函〉，《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439。

³⁵ 徐望之，《尺牍通论》，页160。

³⁶ 徐望之，《尺牍通论》，页14。

的体系。十二世纪初，宋代官方书信快递系统业已发展完善，官员间互相传递书信亦有完整的流程，相反，当时欧洲的书信发展似乎未成气候，书信传递多数依赖自家奴仆。³⁷借由观照欧美与中国的差异，不难察觉，无论是传递统或伦理规范，中国的书信系统在早期就已有规划性的发展。

基于书信是精英阶级的来往工具，书信在言语之间，难免会有“装腔作势”的恭维笔法，以维持双方颜面。过渡时期之书论仍照搬旧套，以装腔的笔法书写：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钱玄同（1887-1939）回复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收录在之〈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信中其直言：“我实在没有空工夫来打这无请的笔墨官司”³⁸，尔后仍附上恭维句以维持论战的和谐：“今得足下之‘忠告’，此后主张，自当益求‘进锐’，切戒‘退速’，以副雅意。”³⁹。这种书信的“亲疏得宜”⁴⁰特征更利于清末民初文人间之正面论学，促使书信体成为了报章论战的主文体之一。

以上针对书信书写的追溯，可见书信整体统的发展稳定。书信自汉以来之通行，以致其受到文学家与政府的关注，故得以持续性的发展。历经多次文学革命，甚至时至过渡时期，都未被革新文学分子去除，成功从明清兴盛至过渡时代，进而衍生出书信体时论。

第二节 过渡时期之书信体时论

从本文的讨论中，可见得书信承接了大部分的固有书写传统，并无过多的变

³⁷ 熊雍、徐力恒，〈12世纪中国和西欧的书信文化——一个比较〉，《北大史学》2016年第20期，页335。

³⁸ 钱玄同，〈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钱玄同复南丰没以美会基督徒悔信〉，《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627。

³⁹ 钱玄同，〈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钱玄同复南丰没以美会基督徒悔信〉，页628。

⁴⁰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页456。

更。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提出“救亡图存”，报章便开始出现不同的书信体时论，其中以呼吁行动的公开信与辩驳私信为主。随着环境与对象的变化，书论与以沟通为目标的书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篇幅的扩张。通信尺牍尚短而精，而书论却是往一般文体的篇幅发展：

尺牍文字尚短隽，长篇书牍，固与其他文字相同，惟短札一二行，意逐则止，而其情缕缕，片语胜于长言者，此亦尺牍文字之奇观也。⁴¹

书论服务对象不再只是相同思想领域的写信和收信者，一旦书信公开在公共领域，服务对象就会扩展至首次踏入书信内容领域的读者，故需以长篇幅补充资讯。《梁启超家书》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所载之书信的差别，便是书论改变的力证。

书信因外在呈现的方式与环境的转变，从一般写信者与收信者的二元关系，转向写信者、收信者、读者之间的关系。写信者的书写目的，是为了同时传达信息给收信者和报章读者，往往自以为无关的人也会变成预设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惊觉与信中所谈之议题有关，变成真正的收信者。书信互动关系的角色变化，或可借鉴欧美书信性质来观照差异：

A letter is any written message addressed by one or more persons to another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to whom the message is expected to be delivered, or anything that is written in this form.⁴²

⁴¹ 徐望之，《尺牍通论》，页 15。

⁴² Jordan Zweck, *Epistolary Acts Anglo-Saxon Letters and Early English Medi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8), 20.

由此可见，欧美书信不再如一般单一写信者与收信者，往往两者都不限于一人而已。书论与欧美书信相似，不再局限于私信的双人互动模式，公布在公开领域中，使得书信的变成一种集体的书写与阅读。书论的创造者，必然是写信者，但同时亦会经过报章编辑的修改；书信的预设读者，除了收信者、还有报章的读者，故原先较于单一的议论空间，变成了一种多面向的讨论。

诚如前文所言，报章还有呼吁性质的公开信，通常都是针对一个群体的读者而写（group of people）。相反，通讯栏里的私信是有一个既定的收信者，但不一定是报章的记者，亦可是以报章作为媒介给特定收信人。事实上书论写信者不在乎收信者是否看到刊登的书信、或收信者是否存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报章读者与建立一种意识形态，例如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之〈文学革命之反响〉，钱玄同伪装保守派的“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诸君子”⁴³或《公言报》上的〈林琴南致蔡元培函〉：“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惟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⁴⁴便知来信的人的比起收信者的回复，更在乎作为报章读者是否有看见公开信。是以，书论的本质已不是建立写信人与收信人的桥梁，因为若只是简单的沟通，何必公开书信于报章上？大可直接寄信。

若仅以书信的公开，并不足以形成一种书信的多声调讨论，叶韦君针对个人经验在通讯栏的研究总结三种通信方式⁴⁵，指出了书信“公众”形成的主要原因：

表现报刊将私事转为公事的媒介特性，但光是公开刊载并不足以形成“公众”，读者需要激发共鸣的议题，需要有意义规划的版面，需要编辑情理兼具的回

⁴³ 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王敬轩君来信〉，《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 265。

⁴⁴ 林琴南，〈林琴南致蔡元培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 275。

⁴⁵ 叶韦君总结了编辑引导读者将个人经验引入公共领域，并形成一种公众的三种方法，分别是：以个人生活咨询、以个人生活经验回应社会问题、以个人观点挑战社会禁忌。（叶韦君，〈个人经验与公共领域：《妇女杂志》通信栏研究（1915-1931）〉，《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7 年第 29 期，页 89-91。）

应。⁴⁶

正如叶氏所言需有意义的规划，在通讯栏中编辑会参与回答来信，尽管编辑不是收信人。但除了编辑的回应能够引起共鸣，我认为编辑对书信节录裁剪都在影响读者的眼光落地之处，提高书信议题的关注度。根据表（一）所整理出参考书论中，编辑的介入可分为以下三类：

首类，编辑会裁去书信的特征，即开头与结尾的恭维句，集中在书信议论主体，如《新民丛报》刊登的〈东海公来简〉（图一）、〈章太炎来简〉（图二）等皆属这类。次类，编辑会节录与报馆宗旨相同的议论部分，或有利于其主张的部分刊登在报章上，《新青年》刊登吴敬恒〈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正是典型的例子，钱玄同为其做的注中言及：“现在接到吴先生寄来全信，才知道登在《时报》上的只有十分之三，还有十分之七改登上海《中华新报》”⁴⁷编辑会依据报馆宗旨与目的来刊登书信内容，吴氏之所以完整刊登在《新青年》，因为钱玄同是该报的编辑，主张文字革新，故以吴氏之信来教导读者。末类，编辑截取书信部分内容，如《新民丛报》（第二十号）〈法时尚任斋主人复简〉仅截取其议论“中西学比较，真理愈出”的讨论、《新民丛报》第二十四号〈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则是只截取曾文正传的讨论。

⁴⁶ 叶韦君，〈个人经验与公共领域：《妇女杂志》通信栏研究（1915-1931）〉，页 91。

⁴⁷ 吴敬恒，〈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 469。

名家談叢

飲冰室師友論學牋

東海公來簡 壬寅五月

(前略)

二十世紀中國之政體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數年而未嘗一對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對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誡爾後益緘口結舌雖朝夕從公游猶以此大事未嘗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僕初抵日本所與游者多舊學多安井息軒之門明治十二三年時民權之說極盛初聞頗驚怪既而取盧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心志爲之一變以謂太平世必在民主然無一人可與言也及游美洲見其官吏之貪詐政治之穢濁工黨之橫肆每舉總統則兩黨力爭大幾釀亂小亦行刺則又爽然自失以爲文明大國尙如此况民智未開者乎因於所著學術中論墨子略申其意又歷三四年復往英倫乃以爲政體必當法英而其着手次第則又取租稅訟獄警察之權分之於四方百姓欲取學校武備交通謂電信鐵道郵遞之類之權歸之於中央政

图（一）：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三号〈东海公来简〉首段部分被裁剪⁴⁸

⁴⁸ 黄遵宪，〈东海公来简〉，《新民丛报》第十三号（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页55。

時務者分類編輯爲小學中學書其他訓詁名物歸入專門聽人自爲之而彼輩反以四書五經爲重四也吾以爲學校務求其有成科舉務責人以所難此不能兼行之事今變學校乃於十三經外更責以九通通鑑舉世莫能究其業此又束縛人才之法也而彼輩乃兼行科舉五也吾以爲興學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貫之事今興學校乃專爲翰林部曹知縣而設然則聲光化電醫算諸學將棄之如遺乎抑教以各業俟業成而用之治民蒞事乎而彼輩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於學校六也且吾意此朝廷大政斷非督撫所能畫疆而治者如有用我以是辭之

(後略)

章太炎來簡 壬寅六月

(前略)酷暑無事日讀各種社會學書平日有修中國通史之志至此新舊材料融合無間興會勃發教育會令作教育襍志作新譯書局令潤色譯藁一切謝絕惟欲成就此志竊以今日作史若專爲一代非獨難發新理而事實亦無由詳細調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貶人物臚敘事狀爲貴所重專在典志則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鎔鑄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說自與通考會要等書徒爲八面鋒策論者異趣亦不

三

图(二): 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三号〈东海公来简〉尾段与〈章太炎来简〉首段被裁减⁴⁹⁵⁰

⁴⁹ 章太炎,〈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十三号(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页57

⁵⁰ 黄遵宪,〈东海公来简〉,页57。

虽然内容编辑影响了读者的注意目光，仍不足以带入公共领域，需配合时间感的突出方能促成。报章与书信具备被强调时间的特点，前者因固定时间出版的习惯，而后者则是书写传统上有记时的惯例：“书札封寄，应记明某年月日，因近世通讯，不仅问起居，道思慕而已。”⁵¹报章的日期作为一种领域的标记，将所有事件并列在同一个时间领域里，即报章出版的当下，而书信的日期被视为一种桥梁将读者引入特定事件讨论场域，亦可将书信日期视为一种事件的索引。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1936-2015）提及报章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方式，不是因为报章能够导民，而是报章能够让一切变得真实：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spaper reader, observing exact replicas of his own paper being consumed by his subway, barbershop, or residential neighbours, is continually reassured that the imagined world is visibly rooted in everyday life.⁵²

过渡时代报章之普及，固然能让读者更加相信书信的真实性，而往往添加真实感是日期，即与读者有关的日常时间，因为其让人觉得“我们”皆共处同一个时空，故所有讨论都会“与我有关”。书信突出了公共领域议论的时间，其出现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类：

首类，书信传统中有署名后记时的惯例，以供考察书信书写日期，如《新青年》通讯栏中的书信多数皆属此类。次类，编辑为书信修改日期的位置，凸显某个时间段来说明事件的关联性，如及上图所列之〈东海公来简〉（图一）、〈章太炎来简〉（图二）等皆属此类。末类，书信内文中出现日期，通常都会在首段，如《新民丛报》第二号〈尺素五千纸〉（图三）。次类与末类排列方法，与传统书信将日期标明在末段不同，更能够凸显时间的存在，使读者不得不意识到时间。

⁵¹ 徐望之，《尺牋通论》，页 57。

⁵²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35-36.

國聞短評

尺素五千紙

拜啓。北京政府最妙外交手段莫如與人結密約。聞中俄又結西藏密約矣。其詳不可得而聞。其第一條則與光緒十年朝鮮之役與日本所結天津條約大相彷彿。即西藏有事之時俄國欲派兵往先照會中國。中國欲派兵往亦先照會俄國也。讀者試思我中國今日安得有派兵往西藏之事。西藏竟是俄人囊中物了。聞主其事者榮中堂也。某白。六月二日。

讀者足下。今日（西歷七月十一日）英首相沙士勃雷侯辭職。國庫大臣巴科代之。沙侯可謂三島政治界中之張子房矣。侯自始入議院至今四十九年。凡三度組織內閣。位首揆者十四年。今年七十二歲。其思退隱已非一日。徒以波亞戰事未了。身任其難。今和議已成。遂翩然挂冠。立憲政體之祖國。其政治家之風度。殊加人一等。可勝欽慕。某再拜。六月七日。美國某華文報主筆。有自署太平洋客者。新著一書。名曰『新廣東』。登諸報中。凡三十

图（三）：《新民丛报》第二号〈尺素五千纸〉

书论日期是一种时间性的追求，写信者通过时间的精确突出，表现一种“共时性”⁵³，往往能够让读者地投入其所营造的某一瞬间。正如图三〈尺素五千纸〉，行文谈及的“今日”便是一种书信所呈现的当下的状态，让时间停留在事件的日期。此种做法突出了当下的议题急迫性，因为书论排除所有当下以外的过去，断绝连续的时间线，读者在阅读时自然进入了当下的时间。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就认为：“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⁵⁴书论所呈现国难的迫切与真实，正就是依靠当下共时所建立的。

书信以不同的形式来说明一段时间内所发生事情和论战，并强调其同时发生在人人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一种公共领域的议题。书信日期静静悄悄地把读者引入一个由时间建立的公共领域，让他们相信书信所讨论的是一种生活日常的要事，进而成为共同体（中国国民）的参与者。

那为何书论各异，读者仍能感受到其国患之真实？因书论共享一种基本条件，具备同一性⁵⁵。书论所构成的实体不仅是纯文体上等偶然材料，如书写方式等，而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日期的突出正是它的共时性的基本条件。简言之，书信日期作为一种共同点，内含社会背景的要素，使读者无法避开当下状态的约束，以救亡视角来阅读。读者一旦察觉到书论的时间，便能辨识其中的意识，例如过渡时期刊登在《新民丛报》与《新青年》的书论，不约而同的讨论国家政体与新文字等议题，而此时日期的突出无疑是一种察觉“救亡图存”的同一要素。

报章上大量的信息串流，无疑书信最为适合成为报章文体，因其具备处理信

⁵³ “共时性”是费迪南·德·索绪尔提出语言研究的内在二重性的其中一个。索绪尔认为语言对于说话者而言，它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摆在他面前是一种状态。所以语言学家要了解这种状态，必须把产生这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他要排除过去，才能深入到说话者的意识中去。（【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明凯、岑麒祥、叶蜚声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113。）

⁵⁴ 【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页123。

⁵⁵ 索绪尔所谈及语言的“同一性”，它是共时性的元素，构成语言的基本条件。只要B词能够实现与A词相同的基本条件，就能够获得与A的相同实体。（【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页148。）

息的优势：

Arguably,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referred the epistolary form because it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and with questioning the received order was best conveyed in pluralistic, fragmented textual forms, such as encyclopedias, dialogues, and letters.⁵⁶

书信的对话特质能够提起疑问与回答疑问，对于教育读者是一个良好的工具，如《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通信栏中〈论 Esperanto〉孙国璋致陈独秀信，在一封信中同时回答陶孟和（1887-1960）、钱玄同、胡适（1891-1962）：“答陶先生、答钱先生、谢胡先生”⁵⁷、第五卷第二号通讯栏中〈新文学问题之讨论〉，钱玄同亦是同时回答“朱先生、任先生”。这种多声论调适合一八九八年维新失败后，社会对于国家改革转型的讨论，通讯栏的讨论出现便是力证。

简言之，书信时论书信群体之扩张，其单一的双人互动关系，亦随之扩展成多元的声音。与此同时，书信的原始特征仍为报章服务，成为一种文体优势，对于报章导民具有很大帮助，故其成为报章的主要文体之一。

⁵⁶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5), 141.

⁵⁷ 孙国璋，〈论 Esperanto——孙国璋致记者信〉，《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 184-185。

第三章 书信情与辩：从感性到知性

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谈及“感性”与“知性”的两极化区分，散文若以主客观、理性与情感为对立，则会有两者之分：

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Sense of immediacy）。⁵⁸

以中国书信传统来观造，书信散郁陶，属于感官经验的抒发，其感性的特征应大于知性。实际上，传统的沟通书信确实如此，但读者群体扩大，仅以私人关系提高感性成分已不足促进思想上的交流，需依赖知性来说服报章的读者。我认为书论的感性与知性同时存在于报章，仅报章突出了知性特征，故以下将往下论述。

第一节 书信体时论之情：救亡图存

前文大略所言及，过渡时期之写信者所刻画的国家危难的急迫，正是一种塑造“临场感”意图，即感性之突出。从抒情研究的观点来看，书论之临场感刻画，

⁵⁸ 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余光中集》第八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333。

或许是通过复刻写信者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邀请读者参与所呈现。这种临场感，并非个人的单向抒发，而是犹如高友工的抒情概念：

（抒情）这个观念不只是某一个诗体、文体，也不限于某一种主题、题素。广义的定义涵盖了整个文化史中某一些人（可能同属一背景、阶层、社会、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他们的‘价值’、‘理想’，以及他们具体表现这种‘意识’的方式。⁵⁹

书论里流漏出的不是写信者单方面的抒发，而是一个时代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书信早就不是一般的鱼雁来往，而是夹杂着导民之责的书论，故书信往往都有目的——即建立救危机意识。在未进入书论的讨论，先厘清自一八九八年以迄，救国者所面临社会意识形态之危机：

至迟从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经历接连不断的政治大变动，建立新政治秩序的尝试不断失败，国家的整体力量始终无法凝聚——君主立宪、士绅政治、民族革命、共和政体、地方自治、政党政治、军阀统治，都归于无效或化为烟尘。⁶⁰

中国社会救国分子企图建立的国家凝聚力，经历多次革命都以失败告终，而其问题症结在于中国国民意识形态无法凝聚。

书论之出现无疑是顺应时代需求的产物，文人选择以书信凝聚“情”，皆因如前文所言其备拉近人之间距离的特性，利于形成中国人彼此相互的同情心。其次，

⁵⁹ 高友工，《中国美典与文学研究论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页95。

⁶⁰ 陈弱水，《公义观念与中国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64。

书信体自汉代发展起讫，文体面貌大约已奠定了下来，变化不大，具备高友工言及之“同质性”⁶¹。概括地说，书信历经文字改革或革新派对韵诗的唾弃等，始终保持其“尽言”的书写传统，甚至同化白话文因素，成为其进化之养分。书信集体叙述着一种救亡图存的话语，尽管各派主张互不相容，但皆可看出各派以自身的价值刻画出“理想”与“敌人”作为临场感之描绘手段。

书论的优势似乎适于培养社会之同情心，以书论感性突出来救亡，看似合理，但同情心又何以解决凝聚力涣散之问题？若能，书信又如何体现这种情感？以上种种正是我欲图解答之疑虑。从书写传统来看，书信本就因同情心而生，其优势在于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共情：

一般说来，在书信中除了那些纯属应酬性的往来信件以外，它总是有所为而作，为了某一需要而写，而且是希望在思想感情上与对方有所交流，以引起对方的响应或同情。⁶²

营造共情是书信与生俱来的天赋。从中国现代文学侧面看书论之写作目的，《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提出现代中国文学是一种缺失话语的讨论，视文学为情感工程，以刻画无感的基层人民来建立情感身份认同的联系，从而让中国人对彼此形成感觉，并互相以同民族的身份相认。⁶³同理，书信亦是同类的时代情感工程，以刻画理想与敌人之立体，建立国民之间联系的同情心。

⁶¹ 陈世骧著《中国文学的文化要义》一文中谈及“同质性”（homogeneity）形容中国文学，它处于一个完全自然生长的机体之中，外来因素在其间被持续同化，中华民族特性的生息也始终持久。（【美】陈世骧著，张晖编，《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页34。）

⁶²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页373。

⁶³ 【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页35。

诚如前文所言，共同体的情感是通过理想所营造的，唯有理想的社会所带来的好处，方能引起个人对于他人或社会的共情。书论所论及的理想不如一般议论散文个体的大篇幅讨论，而是通过信之间的对话中显现出来的。首先便是前文言及的编辑会通过截取书信来引导读者阅读，读者通过阅读报章认为的书信重点自然地吸收资讯。根据表二整理出来的结果来看，《新青年》通讯栏讨论较为激烈便是理想中国文字的部分，时至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前三年，通讯栏更为激烈，编辑会以题目为来信的论战做一个分类，形成一种多声调的议论文体。

在每个标题的底下的论战，不妨是持反面意见的论战与赞成意见的（参见表十二），例如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论 Esperanto〉有孙国璋（1886-1965）、钱玄同、陶孟和三人来信，其中陶氏与孙氏持相反意见，来信辩“世界语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诸邦，已过讨论之时代。”⁶⁴这种多声的呈现中国理想并不仅限于同一刊物，一九零三年《黄帝魂》所刊登的章炳麟（1869-1936）之作〈驳康有为书〉，便是针对康有为刊登在《新民丛报》（第十六号）（1858-1927）之〈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驳康氏指中国不可革命之说，两封书论跨越式地讨论了中国革新理想方式。书论不断分享国家理想之狂热，并且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声调——主张和反对汉字替换成文字、革新等（参考表二），无形中刻画了论战的急迫感。

“敌人”往往是伴随着理想的刻画，书论的对话特质易于塑料对立面。敌人之形象是写信者欲以加之，皆因其制造了被迫害的临场感，从而让读者意识自身与国家的利益是捆绑的，即作为共同体。洋务运动失败后，爱国者急着寻找一个凝聚国民的方法，刻画眼前的欧洲列国便是最好的凝聚中心：“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最关心的公益当然是中国这个国家在外强威迫下的利益”⁶⁵。这种以仇视欧洲列国来呼吁国民团结的书信，数《游学译编》（第六期）所刊登之〈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1903）最为激烈：“今日吾国灭亡之风潮，诚达于极顶，

⁶⁴ 陶履恭，〈论 Esperanto——陶履恭复孙国璋信〉，《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 364。-365

⁶⁵ 陈弱水，《公义观念与中国文化》，页 62。

欧美之白人曰奴灭我……俄人曰奴灭我，并同洲同文本源大陆之区区日本人亦敢隐计日奴灭我。”⁶⁶欧洲列国是主要敌人之一，往后文学革命、慈禧、保皇党等皆被用以制造国家危机的真实感（参见表三）。

敌人作为重要的形象来培养国民共情的重要元素，写信人甚至会塑造假想敌来攻击自己，提高书论的关注。民初著名的伪书案，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之〈文学革命之反响〉中伪装王敬轩来信攻击文学革命⁶⁷，“王氏”狂妄的保守派形象，无疑是其为了引起关注而生。钱氏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刊登之〈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中复戴主一来信：“王敬轩君之言，则尤为狂妄”⁶⁸其用意可想而知，即让读者感受到保守派之狂妄与威胁，从而生起危机感。其次，《新青年》中〈读新青年〉刊登了汪懋祖的来信：“各有所其持之理由，不务以真理争胜，而徒相目以妖，则是滔滔者妖满国中也。”⁶⁹准此，即可说明形塑敌人之手段，盛行于文学革命之论战。另有，《新青年》（第六卷四号）刊登的〈蓝志先答胡适书〉，蓝志先（1887-1957）论中国式辩论，说明了塑造敌人的陋习：“遇着有辩论的时候，不是各说各的，即便吹毛求疵，找些不相干的枝叶问题，攻击一顿，落后便彼此对骂。”⁷⁰蓝氏所控诉的丑恶形象，或许对论述无用，但其所产生的危机感，对于建立的国民之间的互联性⁷¹具有一定的效果。

不难发现，书信体之妙不只是停留在双方对话而已，且拉入读者作为第三方，寻求认同，具备亲近读者的特质。尤其刻画敌人与理想时，足以放大情感的渲染，以拉近国民距离，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以国为单位的国民。

⁶⁶ 佚名，〈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页380-381。

⁶⁷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栏中化名王敬轩致信杂志

⁶⁸ 戴主一，〈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戴主一致《新青年》诸君信〉，《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65。

⁶⁹ 汪懋祖，〈读新青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82。

⁷⁰ 蓝志先，〈蓝志先答胡适书〉，《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411。

⁷¹ “互联性”沟口雄三在讨论中国的“共同”是提出的，指宗族之间各小家庭之间共有的权利和利害的互联关系，即群体之间共同利益。（【日】沟口雄三著、郑静译，《中国的公与私·公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页75。）

第二节 书信体时论之知性

前文所言书信具备私人色彩的情感交流，是一种书信的既定印象。书信书写自洋务运动以后，报章的出现与欧美的书写习惯传入，开始进入“反常化”的阶段，即摆脱明清书信只写情感交流的家书习惯，突出书信议论性质。欧美的《英语秘书学》将书信分为四大类：说明性(Demonstrative letters)，商议性(Deliberative letters)，司法性(judicial letters)、通俗性(Familiar Letters)⁷²，唯有前面三种书信的特质是经常交错在一封信里，通俗性则是较似与说明性，但仅是表达通俗的事件，如家中事务的家书。⁷³清末民初书信走入报章的栏目，便是一反书写通俗情感的家书形象，变成“说明、商议、司法”三者杂糅的著作化书论。

书信的“知性”的突出正是因为书信不再是写信者单方面的抒发情感，而是进入到了报章的公共领域，形成一种读者与写信者沟通式讨论，正如《新青年》以议题统整的投信与书论之间跨越刊物的对话，都是一种信与信之间的对话。一旦书信进入了庞大读者群的公共领域，若需呼吁国民振兴行动，通俗书信的书写方就无法再满足时代之需求，因写信者需考虑读者或许是首次接触到信中之内容，需依赖更多的资讯。

具议论性书信文体非清末民初才出现，《尺牍通论》指古人会以书信论学，并称之为学术尺牍类，但此类尺牍与书论不同：

在作者不过认为一时之意见，尚须征询商榷，未敢为遽定论，初无公开示人之意”、⁷⁴

⁷² 说明性书信，主要用于声明、展示、陈述事物；商议性书信则通常有目的，以书信来说服或影响收信人，来达成某一目的；司法性书信则是与法律事务有关的，通常涉及合法、非法、有争议的讨论。(Angel Day, *The English secretary* (London: Peter. Short for C. Burbie;1599), 20.)

⁷³ Angel Day, *The English secretary*, 20.

⁷⁴ 徐望之，《尺牍通论》，页 161。

无疑书论的反常化，是书信不是无公开之意的书写，而是为了公开而写。公开意味着写信者需要负责更多的舆论压力，书写上的用字立意需斟酌思考方能下的定论，列明论点等，因需避免在论战中受反对者的攻击。以论战著名的《新青年》与《新民丛报》为例，写信者往往已知信会被群体阅读，是以都会行文中清楚列明观点，且编辑会为来往的书信辩论附上议论文的标题（图四），以供读者阅读方便。

國民之敵 (續第一號) 陶履卜 著

隨感錄

(19—23)

機器促進大同說 陳獨秀

社會與婦女解放問題 吳敬恆

通信

新文學問題之討論 朱經 胡適答。

新文學問題之討論 任鴻雋 胡適答、附錢玄同跋、朱任二君信語。

革新文學及改良文字 朱我農 胡適答、附錢玄同跋語。

論 Esperanto 區聲白 陶履恭答、附錢玄同陳獨秀跋語。

論 Esperanto 孫國璋 陳獨秀答、附胡適錢玄同跋語。

今之所謂『評劇家』 劉半農 錢玄同答。

图(四):《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通信栏的目录

《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一号起，将来信统整起来，以设立议论标题进行分类与回复，突出了书信的议论性质。议论之知性特质，并不是通过书论之内容而已，其形式亦有变化。报章上的书论与议论文出现同一种列明论点之形式，以数字清楚罗列论点或例子来表达观点（图三、表四、表五）。这种排列的方式能够让读者更快得接受消息，特别是在辩论书信中较为常见，是写信者思想形于外的表现之一。

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朱有昀上

我農吾兄：

老兄這兩次的來信都是極有價值的討論，我讀了非常佩服。我對於世界語和 Esperanto 兩個問題，雖然不曾加入新青年裏的討論，但我心裏是很贊成陶孟和先生的議論的。此次讀了老兄的長函，我覺得增長了許多見識，沒有什麼附加的意見，也沒有什麼可以駁回的說話。我且把這信中最精采的幾條議論摘出來，或者可以使讀者格外注意。

(1) 老兄說：「無論那一種語言文字，祇有因為文字不合語言，把文字改了的；斷沒有用文字去改語言的。」

(2) 又說：「文字是語言的代表，是語言的記號，不可泛泛的稱作一種記號。」

(3) 又說：「文字是隨着語言進化的。將來到了國家種族的思想界限漸漸消滅，五方雜處的時候，語言自然會將漸漸統一的；語言既統一，文字也就統一了。（這一段說得太容易了。其實語言文字的守舊性最難更改。請看瑞士國何嘗不是五方雜處，但語言文字還是德法意三國語並立。）語言斷不能隨着私造的文字改變的，也不會隨文字統一的。……所以憑着幾個人的腦力私造了一種記號，叫做文字，要想世界上人把固有的語言拋了，去用這憑空造的記號做語言，這是萬萬做不到的。」

(4) 又說：「各民族的文字是隨公衆語言的進化漸漸變成的，不是不根本語言，由幾個人私造的。」——古人說倉頡造中國字，又說「造希臘字。要知道倉頡造的是一種記號來代表中國當時的語言，Cretans 造的是一種字母的記號來代表希臘古代民族已有的語言。故月字是倉頡造的記號，但月字讀作 *luna* 可不是他造的，乃是中國已有的語言。懂得此理，便知把中國現有的語言用字母拼音，是可以做到的；廢去中國話，改用別種語言，是做不到的。」

(5) 老兄又說：「語言文字是一個隨時改變的東西，起初頭無論如何簡單如何精良，到後來一經實用，就要變成繁雜不規則的。……因為 *Portuguese* 是個沒有完全發達的東西，所以覺得簡單明瞭。但是等到人人用他做語言文字，……不久就要

圖（五）：《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反對世界語〉——胡適復朱有昀信⁷⁵

⁷⁵ 胡適，〈反對“世界語”——胡適復朱有昀信〉，《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頁423。

论战的书论，固然不能与往日鱼雁来往之书信同日而语，因书论面对的是反方攻击与取悦读者的需求，故其必然会往论说文的特质靠拢。过渡时期以趋向辩体的书论较为通行。辩体书论，旨在破他人来信的主张，故经常在通讯栏出现，表六与表七所列皆是通讯栏之辩体书论。辩体书论最为明显的特征：“文章首先提出前人的成说，然后用“吾意不然”一语抹倒。”⁷⁶写信者清楚认知面对的读者不一定了解或阅读过书论所反驳的文章，故所引的前人成说往往比一般通俗书信或私信来的更清楚。《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在〈反对“世界语”〉一栏，朱有昀致信胡适（1891-1962）清楚的引用陶孟和之语来反驳：‘陶先生说：“世界语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诸……这正是中国文化思想后于欧美之一表象。”’（图六）⁷⁷引出原文段落逐一反驳，即是书信成为论说体的表征。

书信的阅读群的扩张，形成了一种对话形式的知性特征，早已与“尚短隽”的书信背道而驰。辩体在《新青年》占大多数，皆因其文体适合针对他人的主张进行反驳，故大批文人以辩体与书信结合与他人论战。

⁷⁶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页 322。

⁷⁷ 朱有昀，〈反对“世界语”——朱有昀致胡适信〉，《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 416。

們受了這漢字古文的害，已經幾千年了，還要用這注音符字母去挽救他，再使我們的子孫受害麼？

用羅馬字拚法的好處，當另作文討論；以上這三種理由，是我反對注音符字母的主腦；此外還有許多理由，我狠想和盤託出，但是我的閑空時間已經告終了，且待後來再說。

過幾日再有空，當再和先生討論他事。但是我已經寫了三封信給先生，至今沒有得著一封回信，甚念。

七年九月十五日 朱有昀謹啓

反對 Esperanto

適之我兄：

前十天(九月十七日)接到你的信，當時已經奉答了。我前後一共寄給你五封信，一本內外科看護學和一張教會羅馬字拚音報；不知道你已經完全收到沒有？來信煩你提及。

今天我又有一兩點鐘閑空，所以我就趁這個機會，來把我反對 Esperanto 的意見，說給你聽聽。

這件事陶孟和和錢玄同兩先生已經在新青年上討論了，但是我不曾看見第四零二號以前的新青年，所以也不會看見兩先生論調的全體。祇有第二號中錢先生的信，和第四號中孫國璋先生的信和錢兩先生的答書已經拜讀了。

陶先生說：「世界語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諸邦，已過討論之時代，而我輩今猶以寶貴之光陰，討論此垂死之假言語，這正是中國文化思想後於歐美之一種表象。」這幾句話的意思，我狠以為然，但是中國文化思想實在後於歐美，所以我不得不再費些寶貴的光陰——我的閑空時間，比寶貴的光陰更加寶貴，但願看見這封信的人，諒我費去我的比寶貴光陰更寶貴的閑空時間的苦心，用一對歡迎的眼睛來看我反對 Esperanto 的理由，那我就歡喜無量了——來幫助陶先生攻訐 Esperanto。

又陶先生把 Esperanto 稱做「垂死之假言語」，我不以為然，為什麼呢？因為語言這東西，是要已經一國人，一羣人，或者許多

图(六):《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反对“世界语”——朱有昀致胡适信〉⁷⁸

⁷⁸ 朱有昀,〈反对“世界语”——朱有昀致胡适信〉,页416。

总而言之，书论的反常化，不仅是内容上不再如家书或友人间单方面抒发情感，而是更有条理的厘清观点与整理篇幅，往论说文靠拢来说服读者。过渡时期之书论是一种抒情与议论特质并重的文体，且一反以通信为目的，成为一种以导民为目的的著作化“艺术品”。

第四章 公开与公共：书信时论政治化

一般而言，众人皆以为书论之目的仅服务于大众，殊不知于内书论其实充当了写信者之心理调剂。书论并非一如既往的面向观众而已，其存在似乎与写信者的道德与救国之双重忧虑有关。本文欲以从“公开”探讨，书信如何面向写信者，同时以一种私人关系来建立社会的“公共性”。

第一节 书信隐私公开化

中国社会的“公”意义繁多，其中之一便是“公开”，其具备社会性，指向共同、公开的一面⁷⁹。社会公开之公的对立面便是属于个体之隐私，两者是二元对立的。陈弱水将“公”分为观念与语言的两种层面，“公开”正是存在于语言层面：

在中国语言，「公」几乎一直都有「公开」的意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贿赂公行」的话，这个「公」就是公开；《宋书·袁湛传》有言「公坐凌湛」，意思是在公开场合凌辱袁湛。……不过，就个人侦测所及，「公」的「公开」义并没有成为任何类型的公观念的主要内涵，也未与任何主要的社会风习或制度发生密切的连结。

80

⁷⁹ 【日】沟口雄三著、郑静译，《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页 258。

⁸⁰ 陈弱水，《公义观念与中国文化》，页 42-43。

陈氏言及“公开”尚无与社会风气发生紧密的连结，其考证看起来似乎板上钉钉，难以争辩，但于我而言仍有商榷之余地。其实，只要看过王汎森在〈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所整理三种反隐私的运动⁸¹，便知中国有公开的社会风气。其次，除了王氏所谈之形式，过渡时期书信公开化的现象，虽过去一直都不曾被注意，但其亦是近代公开化之主要社会风气之一。

书信本作为抒发个人情思的文体，属于个人隐私，与“公开”是对立的，但因清代文人尚编书信集，往往写作时便存了公开于第三者阅读的心思⁸²。然而，书信著作化的风气与陈氏所言之公开仍有一定的距离，只能视为公开的苗头，因此时著作化仅属于写信者个人心态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书信已成必然公开阅读之读物。

时至近代报章的成立，提供了全面公开化的平台，书信方与公开挂钩成为一种社会风习。报馆的通信栏将书信公开化执行得最为彻底：

“通信栏”最初在中国报刊出现，是带来远方消息的新闻栏目，如《万国公报》（1874-1907）、《时务报》（1896）的“海外通信”、《安徽白话报》（1908-1909）的“地方通信”，或公开同人信件，具有经验分享与观点倡议的“来函”、“投函”等。⁸³

大量的书信刊登在报章上，让无关的读者阅读，成为真正意义上社会性的公开。通过一窥表八的书信，便得知书信公开变成了一种社会风俗，文人们以报章作为通讯的媒介，在报章公开信件沟通，作为先锋养成一种在通信栏公开信件的社会

⁸¹ 王汎森在〈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言及三种反隐私的运动：“乡约中的彰善纠过、检阅私人日记、省过会”。（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页 161-162。）

⁸²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页 200。

⁸³ 叶韦君，〈个人经验与公共领域：《妇女杂志》通信栏研究（1915-1931）〉，页 55。

风气。

通过表八所整理的例子可见，书论使用者们视书信为一种工具，在公共领域之平台交换信息，或引起讨论，或分享他人书信，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书论公开风气。这种以书信在通信栏上交流、辩论的风气可追溯清代的论学传统。余英时（1930-2021）认为清代特殊学术风格之形成与“嚶鸣求友”努力离不开关系，⁸⁴而过渡时期之书信便是延续友人论学传统的最佳文体媒介——“以文会友小寓与书”⁸⁵。从私底下友人间的私信来往，过渡到公开在报章上达到“同气相求”，图求与报章读者达到共情，似乎是继承了清代学人社群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传统心理基础⁸⁶。知识人以此来扩大振兴国家之主张，同时向读者分享“公共亲密”⁸⁷来转化内心忧国焦虑。

王氏认为公开风气是一种急于道德转化焦虑的求助，人们无法以个人力量完成转化，故期望以公开来获得他人之检验与批评来达到道德转化。⁸⁸显而易见，书论与王氏所言无异，其作为过渡时期知识人的求助，即通过公开书信转化忧国与道德的双重焦虑。绪论言及过渡时期的知识人犹如特里林所言，自认肩负批评国家之责任，值得注意，这一种肩负与学者李海燕所分析民初爱国者之迷狂相似，两者都以分享为主，且都希望获取他人反应：

情人追寻一位可以向他或她吐露自己全部感觉的灵魂伴侣，与爱国者寻找可以与他或她分享公共亲密之迷狂的民族同胞，在逻辑上是相通的。⁸⁹

⁸⁴ 余英时，〈原“序”：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文化史通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页120。

⁸⁵ 徐望之，《尺牋通论》，页160。

⁸⁶ 余英时，〈原“序”：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特色〉，页120。

⁸⁷ 李海燕提出“公共亲密”，认为社会所有人都是亲密的共同体，要求对他人公开自己的全部感觉，是五四一代所反叛的那种儒家社会秩序的对立面。（【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页265。）

⁸⁸ 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页162。

⁸⁹ 【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页250。

报章上，知识人之书论分享国家大事，某种程度上与情人间之亲密是逻辑相同的，而这种迷狂是知识人骨子里的道德规范。这种迷狂往往需要向群体抒发，更需要群体的大量回应与批评，犹如第三章所言书论间的“理想”讨论，才能抚平爱国者（写信者）内心的焦虑。

知识人自认肩负“知而不言，其責在煦”⁹⁰的责任（参考表九）。他们都认为自身必须宣扬救国主张，督促国民去实行。显然，这是一种知识人强烈的道德规范。通过表九所列之例子来看，知识人每当一遇见特定事件，心中想起国家与国民，必会生起分享公共亲密之欲望，如〈与同志书〉：“留学他邦，接触見聞，罔非可憤可悲之事，有不能不为諸君一言者。”⁹¹，他们内心中的道德欲望，使其不得不将所见所闻告之于国民，是一种知识人导民之抱负。

王氏认为自明清大夫至五四运动期间，以隐私公开化来借助群众力量，促使自身道德转化之传统从未中断⁹²。过渡时期之书信与王氏所言相符，往往公开书信都是向某人征求意见或呼吁行动，且不抗拒非收信人回复意见，《新青年》上的通讯的信便是力证，尽管来信是写给刊物记者，但经常有读者来信代主编复信，如陶孟和、孙国璋等人（参考表十二）。书论会以“征求他人意见”来改进自己的论述与除去“暗处渣滓”，达到消解内心无从释放的救国焦虑，如《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所刊登的〈胡适致蓝志先书〉直接说明来信公开之目的：“所以我很希望先生肯推诚指教，点出我们壁垒不森严，武器不精良之处。”⁹³

除了主张上的完善，以第三章所言之的革命风气为例，书信的公开吸引了读者以上位者的视角观看两方的辩论，提出有关书信的辩论风度之意见。《新青年》上有多封书信⁹⁴，分别来信批评革新派的风气，指革新派在书信辩论以妖魔

⁹⁰ 佚名，〈与同志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页393。

⁹¹ 佚名，〈与同志书〉，页393。

⁹² 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页174。

⁹³ 胡适，〈胡适致蓝志先书〉，《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398。

⁹⁴ 《新青年》〈读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中的〈汪懋祖致胡适信〉、〈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第五卷第

攻击对方，过于偏激。对此，虽然革新派里的钱玄同与陈独秀认为革命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有异议”⁹⁵，但胡适经过沉思后，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中〈读新青年〉中回复汪懋祖的信中忏悔：“我如今想来，这话似乎太偏执了”⁹⁶，胡适之沉思反省的是一种道德转化之行为，无疑是因书信公开集结了书信者以外的人，给予的意见与督促，帮助其实现道德提升。

书信公开化是一种个人隐私的公开，利用群众的力量帮助个体转化道德与亡国的双重焦虑，其所形成的是以鱼雁来往之私人关系所建立的政治秩序，成为一种公私掺杂的国家凝聚力。

一号）中〈戴主一致《新青年》诸君信〉、〈新文学及中国旧戏〉（第四卷第六号）中的〈张厚载致记者信〉等皆来信投诉文学革新派辩论风度不佳。

⁹⁵ 胡适，〈读新青年——胡适复汪懋祖信〉，《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页83。

⁹⁶ 胡适，〈读新青年——胡适复汪懋祖信〉，页83。

第二节 书信体书论之公共性

一般而言，过去皆认为书信是属于小群体之间的交流。不过，随着书信的公开，知识人针对国家兴亡之议论声音流入公共领域，小群体的讨论亦随之扩张。报章作为一个思想交换的公共领域，书信作为桥梁连接了读者与写信人思想领域，将读者的声音带进了公共领域，使讨论声音更为多元。不难发现，报章书论正在以公开化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即“公共性”，来弥补凝聚力涣散的社会问题。

所谓“公共性”是中国“公”概念之延伸物，通过沟口雄三尾针对日本与中国的“公共”的比较讨论，便能察觉中国的“公”之独特性：

日本的公的共同、公共的内涵，是我们在福泽的“户外公共之事”、“与公家无缘的子弟”等等说法中所看到的某种领域性；而中国的“共同”，是“一样干”、“一起干”，这种相连关系。我想将它们分别称为领域的共同和互联的共同。⁹⁷

显然第二章所谈的凝聚力便是这一种“一起干”公共性，其不同与公开化作为社会思想观念，它仅是“公”语义发展的其中一义⁹⁸，故中国社会并无认真实践。作为附属的语义，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国民与国家互联不强之问题，国民认为其责任在于宗族事务而已，而国家事务则是当权者的责任，与己无关，久而久之便形成社会公共精神匮乏。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中国人的性格》言及公共设施反映了中国国民缺乏公共精神之问题，即

⁹⁷ 【日】沟口雄三著、郑静译，《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页75。

⁹⁸ 陈弱水，《公义观念与中国文化》，页42。

中国国民经常将道路的石子与城墙的砖块偷走私用，造成公共设施之破旧。⁹⁹

书信的媒介作用能够解决国民凝聚力不足的问题，其主要方法便是凸显其互联性。公开信通常都会针对一个群体，以呼吁他们行动救国，将一种身份的人引进公共领域的讨论之中。根据表十的整理，公开信针对国民群体较为多，其余都是根据职业、地区、年龄。尽管，公开信群体有多种，但究其根本在于写信者欲将自以为无关事的读者拉近公共领域的讨论，攻法子之〈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七期）证明了当时写信人的目的：“抑某所言者，非仅为浙江一省而已，全中国之地方某愿以同一之言告之，并愿诸省以同一之方法行之。”¹⁰⁰公开信会呼吁特定群体响应特定行动来救国，且不停的强调国民责任与国家存亡的直接关系：

自今以往，若犹不思整顿扩充，则虽日日言中国改革，改革之实终不可举，而诸君之放弃国民责任咎无可辞。¹⁰¹

（〈敬告我乡人〉攻法子，1903）

合一乡之人而立一学堂，合一族之人而立一学堂，协力同心，众擎易举。各有子弟，各有国家，安得不共担责任哉。¹⁰²

（〈与同志书〉佚名，1903）

书论以个人身份参与国事讨论与针对群体的读者，取代了以国君为中心“公”，

⁹⁹ Arthur Henderson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894),108-111.

¹⁰⁰ 攻法子，〈敬告我乡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页 497。

¹⁰¹ 攻法子，〈敬告我乡人〉，页 497。

¹⁰² 佚名，〈与同志书〉，页 393。

成为一种将人人都纳入讨论的公共性。然而，仅以公开信凸显在公共领域凸显国民身份，仍不足以让读者行动加入讨论。唯有公开管道之的设立，国民才能真在公共领域上发声讨论。

报馆责任在于导民，不仅是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而是帮助社会建立影响力的共同实体。以《新民丛报》之名家谈丛的〈饮冰室师友论学笺〉为例，主编会刊登读者来信，以此呼吁更多读者来信讨论。另外，还设立了〈国闻短评〉栏目，读者以来信补充国外资讯，帮助报章教育人民，如〈尺素五千纸〉（图三）、〈尺素五十纸〉、〈尺素六十纸〉、〈尺素七十纸〉等。《新民丛报》以接受来信刊登，无疑是利用各地读者之来信，助其达成导民之目的，其所实践正是全民之公共性。

其次，部分刊物主编甚至会以回复来信，来吸引读者参与讨论，如《新青年》一九一六年的主编陈独秀通过刊登不同的文章与回信来吸引国民来信参与讨论：

源头	复信	复信	复信	复信
1 胡适致陈独秀信（第二卷第二号、1916）	陈独秀复胡适信（第二卷第二号、1916）——回答	陈独秀复曹乃德信（第二卷第二号、1916）		
	曹乃德致陈独秀信（第二卷第四号、1916）——提出质疑			
	刘半农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三号、1917）——提出意见			
2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二月十五日钱玄同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一号、1917）——提出意见	五月十夜胡适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四号、1917）——回答	二十世纪初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致胡适信（第三卷第六号、1917）——回答反驳	胡适致钱玄同信（第四卷第一号、1917）
	曾毅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二号、1917）——反驳	陈独秀复曾毅信——回应反驳		
3 《新青年》第四、第五号有关孔教的两篇文章	俞颂华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一号、1917）——反驳	陈独秀复俞颂华信（第三卷第一号、1917）——反驳		
3 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	四月九日胡适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三号、1917）——反驳			
4 四月二十日俞颂华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三号、1917）	陈独秀《再答俞颂华信》（第三卷第三号、1917）			
5 T. M. Cheng致记者信（第二卷第三号、1917）	记者复T. M. Cheng信——回答（第二卷第三号、1916）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四号、1917）——提出意见	陶履恭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四号、1917）——提出反驳	陈独秀致陶孟和信（第三卷第四号、1917）——提出反驳

表（十一）：《新青年》书信讨论表

以较为轰动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例，提及的改良文学的八个主张，一刊登便引起社会的众论。这篇文章出现以后引起了报章上许多的来信，先是引来钱玄同、曾毅等人提出意见与反驳，尔后如雪球般的扩张，主编陈独秀帮助胡适回应曾毅反驳，胡适与钱玄同之间又互相讨论，形成不同人之间的双人公开讨论。后期出版的《新青年》亦有大量有关文学改良的书信议论题目，如〈新文学之运用〉、〈新文学之问题讨论〉等（参考表十二），都是针对胡适所言之文学改良做出回应等。表（十二）所罗列的书信题目便是主编根据来信题材与针对收信人进行的分类，这些书信本只是来信分享个人主张或回复他人看法，但

其中几位轮流主编钱玄同、胡适、陈独秀等人的策划，如以个人主张复信或伪装来信人等，刺激了域外的读者来信一起讨论。

虽说，叶韦君认为伪信对于研究者有难度，但是其的确能够得到社会激烈的回响。¹⁰³从钱玄同伪装王敬轩来信攻击革新派引起的批评与讨论来看，的确激进的来信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无论读者或写信人都能明确感受事情的保守派威胁，从而来信参与讨论或抨击，如戴主一、汪懋祖、蓝志先来信讨论革命态度等。书信大量的来往于公共领域，常常会吸引读者来信参与讨论，成为一种书信形成的公共性。

杜威（John Dewey, 1858-1952）言及双人交互行为，往往能够产生一种公共精神，而这种精神便是过渡时期之书信通过“救亡图存”之意识所营造的：

When A and B carry on a conversation together the action is a trans-action: both are concerned in it; its results pass, as it were, across from one to the other. One or other or both may be helped or harmed thereby. But, presumably, the consequences of advantage and injury do not extend beyond A and B; the activity lies between them; it is private. Yet if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conversation extend beyond the two directly concerned, that they affect the welfare of many others, the act acquires a public capacity.....¹⁰⁴

书信的对话本属于两人的私人活动，但是往往谈及的利益与伤害都是集体，正如公开信针对国民留学、支助保皇、读书等的讨论，都正在说明个人责任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其次，第二章言及私信来往的“理想”与“敌人”的刻画，皆是以刻画临场感，让自以为无关之读者感受集体利益与伤害。通过书信来往的讨论与策

¹⁰³ 叶韦君，〈个人经验与公共领域：《妇女杂志》通信栏研究(1915-1931)〉，页 56。

¹⁰⁴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6), 67.

划的回应，使得读者清楚自己是国家兴亡之影响者，来信参与公共领域之讨论，从而杜威所言之公共能力便形成了。

更有趣的是，公共领域是“公”，所论之事皆属众人之事，或可说是与人众人相关之政府事物，与他相对的是具有民间意思是“私”¹⁰⁵，但过渡时期却以私人关系通信来建立公共领域的秩序，无疑是一种“公中带私”。无可否认，“公中带私”置放在过渡时期其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因以私人之鱼雁来往的确能够更为紧密与迅速地连接涣散的社会，建立社会“公共性”来对抗亡国危机。

¹⁰⁵ 〈陈弱水所分类的公之“类型一”〉：“既然“公”的一个主要涵义是政府、朝廷或政府事务，与它相对的「私」，就有民间的意思。”陈弱水，《公义观念与中国文化》，页 21。

结语

书信文体拥有稳定的发展基础，无论社会制度与风气上，已有完善的传承，故其得以传承至清末民初。虽说，书信体时论承接“尽其本心”的书写传统，体裁题目上无如诗赋等之约束，更易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但私人书信局限于有限的两人互动关系中，无疑是难以负荷清末民初之时代需求。书信唯有外延公共领域，方能救亡，故书论颠覆了以往“迅速、保密”¹⁰⁶的要求，意味着不再只服务二人的互动关系，往往是通过前者来公开处理群体的互动关系。

知识文人为了形塑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以书论作为媒介，先将人人引入公共领域中。书信由编辑与写信者合力“书写”吸引读者的目光，再凸出其时间，让读者主动地捕捉“与我有关”的当下瞬间。无疑，这种互动关系的本质变化，似乎毫无影响书信的传统特征之优势，在处理庞大的读者群时，书信仍能够抒发本心，且以处理信息之优势达到公共领域的双向抒发。过渡时期书信体时论，本在尽心，本在救亡图存，成为一种时代集体发声的媒介。

书信文体具备陈世骧所言之“同质性”，在书写个体之情感外，其稳定性吸收时代变化与需求，内化成书信材料，书论所谈之“理想”与“敌人”皆是时代的材料，以及以建立过渡时代之凝聚力为目的之手段，可见书信之影响力业已超越二元关系。梁启超谈及报章之功用言：“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¹⁰⁷，报章所针对读者皆是知识读者，然书信是作为报章一种反常化的教导，与一般演说和学校单向的输出不同，其图求的是一种群体式互动。以此作为前提，其书写的形式亦随之改变，不再写单方面抒情的书信，以议论题目统整书信，书信体裁亦趋向辩题发展，整体上以对话与辩论需求为主，显然与私信无论在形体或本质已有不同。

书信是私密的，单向抒情，也是个人，仅仅发挥处理私人关系的功能，不具备任何教导的天赋，可书信时论则不然，书论是面向公开的，双向抒情，也是

¹⁰⁶ 陈五云，《书信大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页14。

¹⁰⁷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文明普及之法》，《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页46。

公众的。书论通过在公共领域发声，实践知识人的自我责任，是一种个体的道德与救国焦虑的转化，而鱼雁公开来往则是知识人之“嚶鸣求友”心理欲望的体现，以扩张大讨论关系转化内心救国孤独与焦虑。与此同时，书论来往去除“暗处渣滓”，形成了一种全民合作的公共性，诚如杜威所言：

Many private acts are social; their consequences contribute to the welfare of the community or affect its status and prospects. In the broad sense any transaction deliberately carried on between two or more persons is social in quality. It is a form of associated behavior and its consequences may influence further associations.¹⁰⁸

书信的互动被公开，两人之间私人行为的互相影响，扩展至公共领域里的读者，最终形成一种公众，即互联的中国国民群体。这种互动的扩展，使得读者加入通信栏中的讨论，以来信回复报章上的书信，成为一种以书信作为媒介来加入“救亡图存”的公共精神。

书信的真诚特质随着书写环境的转换，其“本在尽言”的功能亦因救亡图存的意识形态而改变：

'I sincerely believe' has less weight than 'I believe'; in the subscription of a letter, 'Yours sincerely' means virtually the opposite of 'Yours'.¹⁰⁹

诚如特里林所言及真诚贬值，欧美书信敬语“Yours sincerely”不再呈现一种真诚

¹⁰⁸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67.

¹⁰⁹ 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26.

的语义，而是在真诚消失的时代作为一种强调写信人真诚的符号。过渡时期的书信亦然，以书信文体传统抒情与尽言来建立一种政治秩序，其中写信人与编辑有意识的去引导读者，已不再是真诚的表现，书信也沦为一种强调真实、真诚、救亡图存的著作化文体。

参考文献

1. 【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着、方珊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2. 【法】弗雷德里克·卡拉着、李俊仙译，《书信体小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3. 【美】李海燕着、修佳明译，《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4. 【日】沟口雄三著、郑静译，《中国的公与私·公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5.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
6. 【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明凯、岑麒祥、叶蜚声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 【清】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
8.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9. 陈独秀主撰，《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1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10. 陈独秀主撰，《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1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11. 陈独秀主撰，《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1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12. 陈独秀主撰，《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7月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13. 陈独秀主撰，《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1918年8月1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14. 陈独秀主撰，《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1918年10月1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15. 陈独秀主撰，《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1919年4月1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1954。

1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7. 陈五云，《书信大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18.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9. 高友工，《中国美典与文学研究论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
20. 苟志效、陈创生，《从符号的观点看：一种关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符号学阐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21. 黄遵宪，《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
22. 梁启超主撰，《新民丛报》第十三号，光绪 28 年 7 月 1 日。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
23.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页 46-4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4.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5.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6.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四集，页 114-11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7.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8. 鲁迅，《坟》，《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9.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0. 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页 3-6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1. 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页 162-180。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
32. 熊雍、徐力恒，〈12 世纪中国和西欧的书信文化——一个比较〉，《北大史学》2016 年第 20 期，页 328-343。

33. 徐望之,《尺牍通论》,烟台:中国银行同人消费合作社,1935。
34. 叶韦君,〈个人经验与公共领域:《妇女杂志》通信栏研究(1915-1931)〉,《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7年第29期,页51-101。
35. 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余光中集》第八卷,页333-343。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36. 余英时,〈原“序”: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文化史通释》,页107-128。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37.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38.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39. 周作人,《雨天的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0。
40.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41. Day, Angel. *The English secretary* London: Peter. Short for C. Burbie; 1599.
42. Dewey, John.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2016.
43. Herman, David; Jahn, Manfred; Ryan, Marie-Laur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London: Routledge;2005.
44. Janet Gurkin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 Columbus :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
45. Smith, Arthur Henders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894.
46. Trilling, Lionel.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47. Zweck, Jordan. *Epistolary Acts Anglo-Saxon Letters and Early English Medi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8.

附录

书信题目	写信者	杂志	年份
〈致大隈重信书〉	梁启超	东亚时论	1898
〈辨革命书〉	康有为	新民丛报	1902
〈东海公来简〉	黄遵宪	新民丛报	1902
〈章太炎来简〉	章太炎	新民丛报	1902
〈法时尚任斋主人复简〉	黄遵宪	新民丛报	1902
〈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	黄遵宪	新民丛报	1902
〈尊疑先生复简〉	严复	新民丛报	1902
〈致寿孝天函〉	蔡元培	浙江旅沪学会《会刊》	1910
《致汪兆铭函》	蔡元培	旅欧杂志	1917
曾毅致陈独秀信	曾毅	新青年	1917
《日本人之文学兴趣》——T. F. C. 生致胡适信	T. F. C. 生	新青年	1918
《汉文改革之讨论》——张月镰致《新青年》诸君信	张月镰	新青年	1918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姚寄人致记者信	姚寄人	新青年	1918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胡天月致钱玄同信	胡天月	新青年	1918
《文学革命与文法》——周祐致钱玄同信	周祐	新青年	1918
《改良文学与更换文学》——胡适致张耘信	胡适	新青年	1918
〈严几道先生致候疑始书〉	严复	灵学丛志	1918
〈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	吴敬恒	新青年	1918
〈致军政府暨国会书〉	孙中山	民国	1918
〈写白话与用国音〉——郭惜黔致钱玄同信	郭惜黔	新青年	1919
〈改良文学与更换文学〉——张耘致胡适信	张耘	新青年	1919

表（一）：报章上具编辑痕迹的书信

序	书信标题	讨论领域	年份
1.	〈论小说及白话韵文〉	改良白话韵文	1917
2.	〈新文学与今韵问题〉	采用新名字、改良现代诗歌韵谱、废除无价值文章（寿序、祭文、挽对、墓志）	1917
3.	〈esperanto〉	世界语之可行性	1918
4.	〈新文学与新字典〉	提倡俗语应用文	1918
5.	〈四声〉	现代文字的发声	1918
6.	〈句读符号〉	繁简二式的标点符号使用方法	1918
7.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废灭汉文之由、世界语之必要	1918
8.	〈论 Esperanto〉	推行世界语方法	1918
9.	〈新文学及中国旧戏〉	改良旧文学与旧戏剧	1918
10.	〈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	中国宗教的正当性、标点符号用法	1918

11.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	四种文字革命、反对罗马拼音取代汉字	1918
12.	〈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	白话文法、罗马字母拼中国音之可行、文字横行排列	1918
13.	〈论句读符号〉	以文字取代标点符号	1918
14.	〈反对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三大坏处	1918
15.	〈劝读杂志〉	革新者应读现代记载，注重现代趋势与知识才能救国	1918
16.	〈文学上之疑问三则〉	白话文与文学用语的适应	1918
17.	〈文学改良与孔教〉	男女平权、爱情关系、西方名词中译、改良孔教	1918
18.	〈新文体〉	兼取新旧文字之价值	1919
19.	〈文学革命与文法〉	培养使用新文字的国民心理	1919
20.	〈英文“SHE”：字译文之商榷〉	英文“女性”他的翻译	1919

21.	〈白话诗的三大条件〉	现代诗的标准	1919
22.	〈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	创立文学范本、设立教科书、审定今韵	1919
23.	〈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	同音字之问题	1919
24.	〈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	文字排列之方便	1919

表（二）：1917年至1918年《新青年》关于文学与文字讨论的通信专栏标题

题目	作者	报章	年份	刻画敌人
清廷、慈禧				
〈致日本东邦协会书〉	梁启超	东亚时报	1898	皇上本非西后亲生之子，当其即位之时，不过拥为虚名，而西后自专朝柄。皇上虽在位二十四载，而于君主应享之权利，实未尝一日能享之也。皇上年既渐长，而外患亦日深。数年以来，屡思发愤改革，皆见制于西后。凡皇上有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加谴逐。
〈复依田百川君书〉	康有为	知新报	1899	勸上收攬大權太監寇良材，亦谓西后归政于皇上。西后后大怒，長汪文安诸君，逐皆贬谪，寇良材被杀，甚至二妃被杖而上於是乎幾幾废矣幸……
〈上振贝子书〉	叶恩	新民丛报	1902	今朝廷之于民也，如防盜賊，如待奴隶，既不大行改革，授人民議政之权，而又日夜抽捐，敲膏吸髓，嚼尽其財，利則无有，害則尽归于民，乐則无有，苦則尽归于民。民虽至愚，岂其堪此！
欧洲列强				

〈敬告湖南人〉	陈 天 华	苏报	1903	试思东三省归俄、广西归法，英、日、美、德能甘心乎？瓜分实策，数月间事也。斯时诸君恹恹何之？欲图抵抗乎？抵抗死也；欲作顺民乎？杀顺民者亦有人也
〈东京留学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	四 川 留 学 生	新民丛报	1904	呜呼！今者列强之灭国新法，实行于中国各省，遂及我蜀父老，其知之否耶，何谓灭国新法？昔之灭国人者，墟其社焉、瀦其宫焉、废置其君相焉，系累其子弟焉，今也不然。
保皇党				
〈敬告同乡书〉	孙 中 山	檀山新报	1903	此书乃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古今来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而泐汉奸者，不可胜计，非独康梁已也
〈复某友人函〉	孙 中 山	警钟日报	1904	顷保皇党出大阻力，以搯弟之行事。彼所用之术，不言保皇，乃言欲革命，名实乖舛，可为僂笑。惟彼辈头领，多施诈术以愚人，谓保皇不过借

				名,实亦革命,故深中康毒者多盲从之。
〈驳保皇书〉	孙中山	檀山新报	1904	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	孙中山	民报	1905	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
文学革新派与保守派				
〈文学革新与青年救济〉——钱玄同复邓萃英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8	不料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后,上有哀皇帝,下有一班死不尽的遗老、遗少
〈五毒〉	爱真	新青年	1918	世界上有五种最大的毒物——(一)国家主义;(二)宗教主义;(三)家族主义;(四)资本制度;(五)污浊思想
〈保护眼珠与换回眼珠〉——陈大齐致钱玄同信	陈大齐	新青年	1918	现在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若想阻止

表(三): 1918年至1919年书信中的敌人刻画

题目	写信者	年份
〈新青年记者答程师葛信〉	新青年记者	1916
〈莫芙卿致陈独秀信〉	莫芙卿	1916
〈胡适致陈独秀信〉	胡适	1916
〈陈独秀致《新青年》记者函〉	陈独秀	1917
〈张护兰致陈独秀信〉	张护兰	1917
〈俞颂华致陈独秀信〉	俞颂华	1917
〈五月十夜胡适致陈独秀信〉	胡适	1917
〈陶履恭致陈独秀信〉	陶履恭	1917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	钱玄同	1917
〈刘半农致陈独秀信〉	刘半农	1917
〈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致胡适〉	钱玄同	1917
〈答 ITM〉	陈独秀	1917
〈程振基致记者信〉	程振基	1917
〈新文学与今韵问题〉——钱玄同致刘半农信	钱玄同	1917
〈论小说及白话韵文〉——胡适致钱玄同信	胡适	1917
〈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	易乙玄	1918
〈陈独秀复易乙玄信〉	陈独秀	1918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姚寄人致记者信	姚寄人	1918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致陈独秀信	钱玄同	1918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朱经白致胡适信	朱经白	1918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胡适致经农信	胡适	1918
〈新文学及中国旧戏〉——张厚载致记者信	张厚载	1918
〈五毒〉——爱真致记者信	爱真	1918
〈文学上之疑问三则〉——张效敏致钱玄同信	张效敏	1918
〈文学革命之反响〉——刘半农复王敬轩君来信	刘半农	1918
〈论 Esperanto〉——陶履恭复孙国璋信	陶履恭	1918
〈论 Esperanto〉——孙国璋致记者信	孙国璋	1918
〈鬼相之研究〉——王星拱致莫等信	王星拱	1918
〈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朱我农致胡适信	朱我农	1918
〈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胡适复朱我农信	胡适	1918
〈反对注音字母〉——朱有昀致胡适信	朱有昀	1918
〈esperanto〉——钱玄同致孟和先生信	钱玄同	1918
〈五月十五日钱玄同致陈独秀信〉	钱玄同	1918

〈新文学与新字典〉——沈兼士致钱玄同信	沈兼士	1918
〈句读符号〉——钱玄同致记者信	钱玄同	1918
〈周作人答蓝志先书〉	周作人	1919
〈蓝志先答胡适书〉	蓝志先	1919
〈胡适答蓝志先书〉	胡适	1919
〈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钱玄同致陈大齐信	钱玄同	1919
〈英文“SHE”：字译文之商榷〉——周作人复钱玄同信	周作人	1919
〈新文体〉——查钊忠致钱玄同信	查钊忠	1919
〈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胡适复陈懋治信	胡适	1919
〈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陈懋治致胡适信	陈懋治	1919
〈拳术与拳匪〉——鲁迅复陈铁生信	鲁迅	1919
〈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钱玄同复潘公展信	钱玄同	1919
〈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潘公展致钱玄同信	潘公展	1919
〈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俞平伯致记者信	俞平伯	1919

表（四）：《新青年》通讯栏的罗列内容的书信

题目	写信者	杂志	年份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东京留学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	东京留学生群体	新民丛报	1904
〈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沧江(梁启超)	国风报	1910
〈对外宣言书〉	孙中山	《天铎报》、 《民立报》	1912
〈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	孙中山	临时政府公报	1912
〈复参议会论国旗函〉	孙中山	临时政府公报	1912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表（五）：其他报章罗列内容的书信

题目	写信者	杂志	年份
〈论教育书〉	严复	外教报	1902
〈辨革命书〉	康有为	新民丛报	1902
〈敬告我同业诸君〉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2
〈敬告当道者〉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2
〈驳康有为书〉	章炳麟	黄帝魂	1903
〈敬告同乡书〉	孙中山	檀山新报	1903
〈驳保皇书〉	孙中山	《檀山新报》	1904
〈驳保皇书〉	孙中山	檀山新报	1904
〈与黄君书〉	严复	庸言	1914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陈独秀	新青年	1916
〈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	戴主一	新青年	1918
〈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蔡元培	《公言报》	1919

表（六）：其他报章的辩体书信

书信题目	写信者	杂志	年份
〈答王庸工（国体）〉	陈独秀	新青年	1915
〈汪叔潜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6
〈陈独秀复胡适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6
〈胡适致陈独秀信〉	胡适	新青年	1916
〈程师葛致杂志社信〉	程师葛	新青年	1916
〈常乃德致陈独秀信〉	常乃德	新青年	1916
〈陈独秀复常乃德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6
〈答陶孟和〉	陈独秀	新青年	1917
〈二月十五日钱玄同致陈独秀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7
〈曾毅致陈独秀信〉	曾毅	新青年	1917
〈四月九日胡适致陈独秀信〉	胡适	新青年	1917
〈再答俞颂华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7
〈五月十夜胡适致陈独秀信〉	胡适	新青年	1917
〈陶履恭致陈独秀信〉	陶履恭	新青年	1917
〈陈独秀致陶孟和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7
〈钱玄同致陶孟和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7
〈陈独秀复俞颂华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7
〈论 Esperanto〉——陶履恭复孙国璋反驳	陶履恭	新青年	1918
〈新文学及中国旧戏〉——张厚载致记者	张厚	新青年	1918
《谈论中国文化戏》——胡适复繆子君	胡适	新青年	1918
〈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钱玄同致陈独秀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8
〈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刘半农复王敬轩君来信	刘半农	新青年	1918
〈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	陈独秀	新青年	1918
〈陈独秀复易乙玄信〉	陈独秀	新青年	1918
〈胡适复汪懋祖信〉	胡适	新青年	1918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任鸿隽致胡适信	任鸿隽	新青年	1918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胡适复任鸿隽信	胡适	新青年	1918
〈论 Esperanto〉——区声白致陶孟和信	区声白	新青年	1918
〈反对 Esperanto〉——朱我农致胡适信	朱我农	新青年	1918
〈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钱玄同致胡适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8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张效敏致钱玄同信	张效敏	新青年	1918
〈文学改良与孔教〉——张寿朋写给记者	张寿朋	新青年	1918
〈鬼相之研究〉——王星拱致莫等信	王星拱	新青年	1918
〈新文体〉——查钊忠致钱玄同信	查钊忠	新青年	1919
〈新文体〉——钱玄同复查钊忠信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9
〈拳术与拳匪〉——鲁迅复陈铁生信	鲁迅	新青年	1919

〈拳术与拳匪〉——陈铁生致鲁迅信	陈铁生	新青年	1919
〈文学革命与文法〉——钱玄同致 S. F 君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9
〈文学革命与文法〉——周祐致钱玄同信	周祐	新青年	1919
《英文“SHE: 字译文之商榷”——周作人复钱玄同	周作人	新青年	1919
〈梁巨川先生的自杀〉——梁漱溟致陈独秀信	梁漱溟	新青年	1919
〈写白话与用国音〉——钱玄同复郭惜黔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9
〈蓝志先答胡适书〉	蓝志	新青年	1919
〈周作人答蓝志先书〉	周作人	新青年	1919
〈胡适答蓝志先书〉	胡适	新青年	1919

表（七）《新青年》通讯栏的辩体书信

题目	作者	报章	年份	引用原文	类别
〈上粤督李傅相书〉	梁启超	清议报	1900	“而此书所言，又知其必不为公累，故除邮寄钧览之外，更布之于各报馆，幸勿为怪。”	形成投信风气、以公开信件引起讨论
〈守常自乐亭寄〉	李大钊	甲寅	1917	“抵里以来，纷于亲朋之访问，未遑执笔为吾报作通讯。”	形成投信风气
〈二月十五日钱玄同致陈独秀信〉	钱玄同	新青年	1917	“倘得借杂志余幅，以就教于胡君”	以报章通讯的媒介
〈读新青年〉——汪懋祖致杂志社信	汪懋祖	新青年	1918	“顷在《季报》中见足下的信，因足下不曾直寄本社，故转登于此。”	转载他人公开信件以回复、以报章作为通讯的媒介
〈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朱我农致胡适信	朱我农	新青年	1918	“我已拿来登在本期《新青年》上，并附有答书”	转载他人公开信件以回复、以报章作为通讯的媒介

					介
〈反对注音字母〉——朱有昫致胡适信	朱有昫	新青年	1918	“前几天我寄交先生的书籍和信，此刻想已经登览了”	形成投信风气
〈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蔡元培	《北京大学日刊》、《新潮》、《公言报》	1919	“读本月十八日贵报，有《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则，其中有林琴南君致鄙人一函”	以报章作为通讯的媒介
〈改良文学与更换文学〉——胡适致张耘信	胡适	新青年	1919	“张君这封信（《改良文学与更换文学》——张耘致胡适信）有许多话未免太过，但他所说的大旨，都很有讨论的价值，故登在此处，供大家讨论。”	形成投信风气、分享书信以引起讨论

表（八）：书信成为一种公开习惯的例子

题目	作者	报章	年份	引用章节
〈敬告我国民〉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3	“吊年非吉祥善事也，吾亦恶其非吉祥善事也，故有所欲陈于我国民。”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湖北张君艇煦与同乡書有云：‘知而不言，其責在煦；言而不行，責在諸君子。’某則謂父老之必无不行也；而或不行者，則又某之言之有不尽之罪也。”
〈与同志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留学他邦，接触見聞，罔非可憤可悲之事，有不能不为諸君一言者。”
〈敬告我乡人〉	攻法子	浙江潮	1903	“某是以不待煩言为諸告。某有言之責，諸君有行之責。”
〈复张之洞书〉	沈翔云	黄帝魂	1904	“惟是公既不憚煩言，吾党亦何忍不举所知，繩愆荆謬，以附忠告”
〈绝命书〉	陈天华	民报	1905	夫空談救国，人皆厌聞。能育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于待至事无可，始从容就死，其于鄙人誠得矣，其于事何补耶？今期鮮非无死者，而鮮終亡
〈留别粤语中父老昆弟书〉	孙中山	中央党务月刊	1918	文则以为吾粵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

表（九）：知识人有“言之责”的例子

题目	作者	报刊	年份	类别
〈敬告我同业诸君〉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2	针对报馆群体
〈敬告当道者〉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2	针对“公仆”（官员）
〈敬告留学生诸君〉	中国之 新民	新民丛报	1902	针对留学生群体
〈敬告我国民〉	梁启超	新民丛报	1903	针对国民
〈敬告我乡人〉	攻法子	浙江潮	1903	针对浙江、全中国之地方
〈敬告同乡书〉	孙中山	檀山新报	1903	针对国外保皇会同乡
〈敬告湖南人〉	陈天华	苏报	1903	针对湖南同胞
〈与同志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针对蜀父老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 航洋游学书〉	佚名	游学译编	1903	针对国民
〈东京留学四川学生 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 蜀父老〉	东京留 学学生群 体	新民丛报	1904	针对革命同志
〈敬告我同志〉	吴懋	民报	1907	针对汉族同胞
〈敬告我同胞〉	吴懋	民报	1907	针对全滇父老
〈敬告全滇父老缴款 赎路意见书〉	宋嘉珍	云南杂志	1908	针对实业商人
〈敬告国中之谈实业 者〉	沧江 (梁启 超)	国风报	1910	针对国民

〈为预备立宪敬告政府及国民〉	汪康年	刍言报	1910	针对国民
〈敬告伦议长〉	汪康年	刍言报	1911	针对议长
〈敬告全国同胞〉	蔡元培	民立报	1913	针对国民
〈敬告各省议会〉	蔡元培	民立报	1914	针对议员
〈敬告青年〉	陈独秀	新青年	1915	针对青年

表（十）：公开信针对的群体类别

	源头	复信	复信	复信	复信
1	胡适致陈独秀信（第二卷第二号、1916）	陈独秀复胡适信（第二卷第二号、1916）——回答 常乃德致陈独秀信（第二卷第四号、1916）——提出质疑 刘半农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三号、1917）——提出意见	陈独秀复常乃德信（第二卷第二号、1916）		
2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二月十五日钱玄同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一号、1917）——提出意见 曾毅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二号、1917）——反驳	五月十夜胡适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四号、1917）——回答反驳 陈独秀复曾毅信——回应反驳	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致胡适信（第三卷第六号、1917）——回答反驳	胡适致钱玄同信（第四卷第一号、1917）
3	《新青年》第四、第五号有关孔教的两篇文章	俞颂华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一号、1917）——反驳	陈独秀复俞颂华信（第三卷第一号、1917）——反驳		
3	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	四月九日胡适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三号、1917）——反驳			
4	四月二十日俞颂华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三号、1917）	陈独秀《再答俞颂华信》（第三卷第三号、1917）			
5	T. M. Cheng致记者信（第二卷第三号、1917）	记者复T. M. Cheng信——回答（第二卷第三号、1916）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四号、1917）——提出意见	陶履恭致陈独秀信（第三卷第四号、1917）——提出反驳	陈独秀致陶孟和信（第三卷第四号、1917）——提出反驳

表（十一）：《新青年》书信讨论表

四卷第一号（1917）	
〈论小说及白话韵文〉	胡适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致胡适信
〈新文学与今韵问题〉	钱玄同致刘半农信
	刘半农致钱玄同信
〈自由恋爱〉	刘延陵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致刘延陵信
第四卷第二号（1918）	
〈esperanto〉	陶孟和致钱玄同信
〈新文学与新字典〉	沈兼士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致沈兼士信
〈四声〉	李锡余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致李锡余信
〈句读符号〉	钱玄同致致记者信
第四卷第三号（1918）	
〈注音字母〉	吴敬恒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致吴敬恒信
〈新文学之运用〉	俞慧殊致杂志社信
	刘半农致俞慧殊信
〈文学革命之反响〉	王敬轩君来信
	刘半农复王敬轩君来信
第四卷第四号（1918）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复钱玄同信
	胡适复钱玄同信
〈论 esperanto〉	孙国璋致记者信
	钱玄同复孙国璋信
	陶履恭复孙国璋信
	胡适复孙国璋信

〈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	林玉堂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林玉堂信
〈日本人之文学兴趣〉	T. F. C. 生致胡适信
第四卷第五号（1918）	
〈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	吴敬恒〈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
	盛兆熊致胡适信
	胡适复盛兆熊信
第四卷第六号（1918）	
〈新文学及中国旧戏〉	张厚载致记者信
	张厚载再致记者信
	胡适复张厚载信
	钱玄同复张厚载信
	刘半农复张厚载信
	陈独秀复张厚载信
〈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	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致陈独秀信
	钱玄同复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信
	陈独秀复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信
第五卷第一号（1918）	
〈文学革新与青年救济〉	邓萃英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邓萃英信
〈读新青年〉	汪懋祖致杂志社信
	胡适复汪懋祖信
〈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	戴主一致《新青年》诸君信
	钱玄同复戴主一信
第五卷第二号（1918）	
〈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	易乙玄来信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	陈独秀复易乙玄信
	朱经白致胡适信

	胡适复朱经农信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	任鸿隽致胡适信
	胡适复任鸿隽信
	钱玄同复任鸿隽、朱经农信
〈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	朱我农致胡适信
	胡适复朱我农信
〈论 esperanto〉	区声白致陶孟和信
	陶孟和复区声白信
	陈独秀复陶孟和信
〈论 esperanto〉	孙国璋答陶、钱、胡先生信
	钱玄同复孙国璋信
第五卷第三号（1918）	
〈论句读符号〉	慕楼君致胡适信
	胡适复慕楼君信
	胡适致觉僧君信
〈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	Y. Z. 来信
	刘半农复 Y. Z. 信
第五卷第四号（1918）	
〈反对注音字母〉	朱有昀致胡适信
〈反对 Esperanto〉	朱有昀致胡适信
	胡适复朱我农信
〈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	钱玄同致胡适信
〈“脸谱”——“打把子”〉	张厚载致记者信
	钱玄同复张厚载信
〈论《新青年》之主〉	易宗夔致陈独秀、胡适信
	陈独秀、胡适复易宗夔信
〈劝读杂志〉	张崧年致记者信
第五卷第五号（1918）	
〈esperanto〉	唐俟致胡适信

	钱玄同复唐俟 信
〈论中国旧戏之应废〉	周作人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周作人信
〈文学上之疑问三则〉	张效敏致钱玄同信
	吴敬恒复张效敏信
	钱玄同复张效敏信
	胡适复张效敏信
〈汉文改革之讨论〉	张月镰致《新青年》诸君信
	钱玄同复张月镰信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姚寄人致记者信
	钱玄同复姚寄人信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胡天月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胡天月信
第五卷第六号（1918）	
〈文学改良与孔教〉	张寿朋致记者信
	周作人复张寿朋信
	陈独秀复张寿朋信
〈鬼相之研究〉	莫等致陈独秀信
	王星拱致陈独秀信
	陈大齐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复莫等信
〈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	陈大齐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陈大齐信
〈五毒〉	爱真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复爱真信
〈文字改革会与国语报纸〉	朱墉谨致独秀、适之、玄同信
〈罗马字与新青年〉	孙少荆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孙少荆信
〈答 Y. Z. 君〉	刘半农致 Y. Z. 君信

第六卷第一号（1918）	
〈横行与标点〉	陈望道致《新青年》诸子信
	钱玄同复陈望道信
〈“黑幕”书〉	宋云彬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宋云彬信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区声白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区声白信
〈新文体〉	查钊忠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查钊忠信
〈摆脱奴隶性〉	王禽雪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复王禽雪信
〈修辞学的题目〉	黄介石致陈独秀信
	陈独秀复黄介石信
〈美术革命〉	吕澄致记者信
	陈独秀复吕澄信
第六卷第二号（1919）	
〈拳术与拳匪〉	陈铁生致鲁迅信
	鲁迅复陈铁生信
〈姚叔节之孔经谈〉	SF 君致记者信
	钱玄同致 S. F 君信
〈文学革命与文法〉	周祐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周祐致信
〈英文“SHE”：字译文之商榷〉	钱玄同致信周作人信
	周作人复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周作人信
〈esperanto〉	周祐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周祐信
〈Esperanto 与现代思潮〉	凌霜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凌霜信

〈对于文学改革之意见二则〉	葬铭氏致《新青年》诸君信
	钱玄同复葬铭氏信
第六卷第三号（1919）	
〈白话诗的三大条件〉	俞平伯致记者信
	胡适复俞平伯信
〈论译戏剧〉	T. F. C. 生致胡适信
	胡适复 T. F. C. 生信
〈改良文学与更换文学〉	张耘致胡适信
	胡适复张耘信
〈日本留学生与日本文学〉	傅彦长致胡适信
	胡适复傅彦长信
第六卷第四号（1919）	
〈讨论：贞操问题—拼音文字问题—革新家态度问题〉	胡适致蓝志先书
	蓝志先答胡适书
	周作人答蓝志先书
	蓝志先答周作人书
	胡适答蓝志先书
〈梁巨川先生的自杀〉	梁漱溟致陈独秀信
	胡适复梁漱溟信
〈鬼相与他心通〉	佚名来信
	王抚复信
	陈大齐复信
〈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	潘公展致记者信
	钱玄同复潘公展信
〈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	陈懋治致胡适信
	胡适复陈懋治信
	钱玄同复陈懋治信
〈写白话与用国音〉	郭惜黔致钱玄同信
	钱玄同复郭惜黔信

〈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	钱 玄同致陈大齐信
	陈大齐复钱玄同信

表（十二）： 书信议论题目底下的来往书信

名家談叢

飲冰室師友論學牋

東海公來簡 壬寅五月

(前略)

二十世紀中國之政體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數年而未嘗一
 對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對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誡爾後益緘口結舌雖
 朝夕從公游猶以此大事未嘗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僕初抵日本所與游者多舊
 學多安井息軒之門明治十二三年時民權之說極盛初聞頗驚怪既而取盧梭孟德
 斯鳩之說讀之心志為之一變以謂太平世必在民主然無一人可與言也及游美洲
 見其官吏之貪詐政治之穢濁工黨之橫肆每舉總統則兩黨力爭大幾釀亂小亦行
 刺則又爽然自失以為文明大國尚如此况民智未開者乎因於所著學術中論墨子
 略申其意又歷三四年復往英倫乃以為政體必當法英而其着手次第則又取租稅
 訟獄警察之權分之於四方百姓欲取學校武備交通謂電信鐵道郵遞之類之權歸之於中央政

图（一）：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三号〈东海公来简〉首段部分被裁剪

時務者分類編輯爲小學中學書其他訓詁名物歸入專門聽人自爲之而彼輩反以四書五經爲重四也吾以爲學校務求其有成科舉務責人以所難此不能兼行之事今變學校乃於十三經外更責以九通通鑑舉世莫能究其業此又束縛人才之法也而彼輩乃兼行科舉五也吾以爲興學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貫之事今興學校乃專爲翰林部曹知縣而設然則聲光化電醫算諸學將棄之如遺乎抑教以各業俟業成而用之治民蒞事乎而彼輩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於學校六也且吾意此朝廷大政斷非督撫所能畫疆而治者如有用我以是辭之（後略）

章太炎來簡 壬寅六月

（前略）酷暑無事日讀各種社會學書平日有修中國通史之志至此新舊材料融合無間興會勃發教育會令作教育襍志作新譯書局令潤色譯藁一切謝絕惟欲成就此志竊以今日作史若專爲一代非獨難發新理而事實亦無由詳細調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貶人物臚敘事狀爲貴所重專在典志則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鎔鑄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說自與通考會要等書徒爲八面鋒策論者異趣亦不

三

图（二）：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三号〈东海公來簡〉尾段与〈章太炎來簡〉首段被裁減

國民之敵 (續第一號) 陶履生 著

隨感錄

(19—23) 陳獨秀

機器促進大同說 吳敬恆

社會與婦女解放問題 華林

通信

新文學問題之討論 朱經 胡適答。

新文學問題之討論 任鴻雋 胡適答、附錢玄同跋朱任二君信語。

革新文學及改良文字 朱我農 胡適答、附錢玄同跋語。

論 Esperanto 區聲白 陶履恭答、附錢玄同陳獨秀跋語。

論 Esperanto 孫國璋 陳獨秀答、附胡適錢玄同跋語。

今之所謂「評劇家」 劉半農 錢玄同答。

图 (三): 《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通信栏的目录

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朱有昀上

我農吾兄：

老兄這兩次的來信都是極有價值的討論，我讀了非常佩服。我對於世界語和 Esperanto 兩個問題，雖然不曾加入新青年裏的討論，但我心裏是很贊成陶孟和先生的議論的。此次讀了老兄的長函，我覺得增長了許多見識，沒有什麼附加的意見，也沒有什麼可以駁回的說話。我且把這信中最精采的幾條議論摘出來，或者可以使讀者格外注意。

(1) 老兄說：「無論那一種語言文字，祇有因為文字不合語言，把文字改了的；斷沒有用文字去改語言的。」

(2) 又說：「文字是語言的代表，是語言的記號，不可泛泛的稱作一種記號。」

(3) 又說：「文字是隨着語言進化的。將來到了國家種族的思想界限漸漸消滅，五方雜處的時候，語言自然會將漸漸統一的；語言既統一，文字也就統一了。（這一段說得太容易了。其實語言文字的守舊性最難更改。請看瑞士國何嘗不是五方雜處，但語言文字還是德法意三國語並立。）語言斷不能隨着私造的文字改變的，也不會隨文字統一的。……所以憑着幾個人的腦力私造了一種記號，叫做文字，要想世界上人把固有的語言拋了，去用這憑空造的記號做語言，這是萬萬做不到的。」

(4) 又說：「各民族的文字是隨公衆語言的進化漸漸變成的，不是不根本語言，由幾個人私造的。」——古人說倉頡造中國字，又說「造希臘字。要知道倉頡造的是一種記號來代表中國當時的語言，Cuthbert 造的是一種字母的記號來代表希臘古代民族已有的語言。故月字是倉頡造的記號，但月字讀作 *yu* 可不是他造的，乃是中國已有的語言。懂得此理，便知把中國現有的語言用字母拼音，是可以做到的；廢去中國話，改用別種語言，是做不到的。」

(5) 老兄又說：「語言文字是一個隨時改變的東西，起初頭無論如何簡單如何精良，到後來一經實用，就要變成繁雜不規則的。……因為 *Portuguese* 是個沒有完全發達的東西，所以覺得簡單明瞭。但是等到人人用他做語言文字，……不久就要

图（四）：《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反对“世界语”〉——胡适复朱有昀信

們受了這漢字古文的害，已經幾千年了，還要用這注音符母去挽救他，再使我們的子孫受害麼？

用羅馬字拚法的好處，當另作文討論；以上這三種理由，是我反對注音符母的主腦；此外還有許多理由，我狠想和盤託出，但是我的閑空時間已經告終了，且待後來再說。

過幾日再有空，當再和 先生討論他事。但是我已經寫了三封信給先生，至今沒有得著一封回信，甚念。

七年九月十五日 朱有昫謹啓。

反對 Esperanto

適之我兄：

前十天(九月十七日)接到你的信，當時已經奉答了。我前後一共寄給你五封信，一本內外科看護學和一張教會羅馬字拚音報；不知道你已經完全收到沒有？來信煩你提及。

今天我又有一兩點鐘閑空，所以我就趁這個機會，來把我反對 Esperanto 的意見，說給你聽聽。

這件事陶孟和和錢玄同兩先生已經在新青年上討論了，但是我不曾看見第四卷第二號以前的新青年，所以也不曾看見兩先生論調的全體。祇有第二號中錢先生的信，和第四號中孫國璋先生的信和錢兩先生的答書已經拜讀了。

陶先生說：「世界語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諸邦，已過討論之時代，而我輩今猶以寶貴之光陰，討論此垂死之假言語，這正是中國文化思想後於歐美之一種表象。」這幾句話的意思，我狠以為然；但是中國文化思想實在後於歐美，所以我不得不再費些寶貴的光陰——我的閑空時間，比寶貴的光陰更加寶貴，但願看見這封信的人，諒我費去我的比寶貴光陰更寶貴的閑空時間，的苦心，用一對歡迎的眼睛來看我反對 Esperanto 的理由，那我就歡喜無量了——來幫助陶先生攻訐 Esperanto。

又陶先生把 Esperanto 稱做「垂死之假言語」，我不以為然，為什麼呢？因為語言這東西，是要已經一國人，一羣人，或者許多

圖(五)：《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反對“世界語”〉——朱有昫致胡適信